



《重庆地方志》编委会

主任：刘文海

副主任：徐斌

委员：夏小平 曾伟 郭永彬

董宁波 熊蜀黔 夏吉敏

陈伟 司逸澈

《重庆地方志》编辑部

主编：徐斌

执行主编：熊蜀黔

执行副主编：陈伟

编辑：周怡彤 张莉 陈欣如

校对：黄仕洁 邱雨婷

主办：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重庆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北四支路

4号信一金典4楼

邮编：400020

联系电话：023-89075121

电子邮箱：cqdfz2017@163.com

印刷：中雅(重庆)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渝) 2024700

# CONTENTS

## 志鉴研究

- 再谈三轮志书质量及其评审…………… 王建设 (2)
- 同治《荣昌县志》文献价值论…………… 滕新才 (9)
- 老物件在方志馆的展示功能…………… 杨立宇 (28)

## 文史纵横

- 云阳教育趣闻…………… 叶仁军 (34)
- 寻幽探奇说寨子…………… 李正权 (40)
- 涪滩说“涑”…………… 姜孝德 (45)

## 地情揽胜

- 路孔古镇的前世今生…………… 陈朝权 (51)
- 清清濯水濯我心…………… 文猛 (60)

## 工作动态

- 2025 年全市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会议召开 …… (封二)
- 《重庆抗日战争志》出版发行…………… (封三)

## 再谈三轮志书质量及其评审

王建设

目前全国业已两轮大规模修志，第三轮修志已启幕，总的趋势是志书质量愈来愈高，但不排除仍存在一些缺陷和瑕疵，整体质量尚有待再进一步提高。

### 一、当前志书仍存缺陷举隅

#### (一) 政治方面

地方志“官书”的性质，决定了政治标准乃其首要质量标准。如不断行进的政治运动，今后三轮修志仍不可避免的还要记述，应怎样记叙才望达到志书所要求的质量标准，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和棘手的问题。一条“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就不仅使我们对记述政治运动畏难，而且对粗到什么程度、细到什么程度，无所把握。首轮和二轮志书编纂的实践表明，一些志书对“粗”与“细”有些地方把握得不很有度。表现在一是全国背景本应粗一些，但有些过细；本地政治运动本应细一些，但有些过粗；二是个人责任应粗一些，但有些过细；整体责任应细一些，但有些过粗；三是小事件应粗一些，但有些过细；大事件应细一些，但有些过粗；四是过程记述

应细一些，但有些过粗；评述、议论应粗一些，但有些过细。对此，作为编者应有宏观和微观的概念，政治运动的反映既要完整、“存真求实”，又要注意详略得体、粗细有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史观。

经过全国两轮大规模修志的实践，明显的“硬伤”如“中国与港澳台等国家”“建国前后”等问题已基本消除。但从“隐性”方面说，由于众手成书，众多编写人员的学识水平、政治素养、文字功底皆各不一，行文中不排除仍存暗含的“瑕疵”乃至提法或语句有误。比如，对改革开放有些事物现象的叙述上，某志“政法篇”中有这样的叙述：“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人、财、物大流动，城区外来人口日渐增多，各种新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刑事案件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以前没有发生或很少发生的绑架人质、持枪犯罪、抢劫杀人等案件相继出现和增多”“改革开放后，经济诈骗案件增多，形式多样”，这些句中，把“刑事案件

不断增加”“绑架人质、持枪犯罪、抢劫杀人等案件增多”“经济诈骗案件增多”的原因，似乎推论归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是不妥的，这是一种隐性缺陷。再如某百村系列丛书，笔者在总纂稿时发现，不少地方在记叙历史上汉、回两民族摩擦、械斗时，称回民为“回回”“回子”，这本是地方的口语化，但这样写入公开出版物中，有明显诋毁回民的意思，易伤害回民的感情，从而引发不良后果。

有鉴于此，三轮志书要更加规范、准确记述，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审慎消除这些隐性的政治性、政策性、法规性问题，避免政治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等出现。

### （二）体例方面

两轮修志 40 年，从实践和已出版的志书论，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但一些志稿在体例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上下限不齐、随意断限，直接影响到下一轮志书上限的确定。其二是篇目设置相互临摹现象比较普遍。每部志书的篇目设置都只能是它那一个地域时间和空间的特殊结合物，有自己的特点、重点、相互关系、运动和发展形式。继承和借鉴都要有选择而不是完全的模仿。依据地方志所涉的范围，反映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尊重本地域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变化的基础上，设置具有自身史学特点的篇目，所编修的志书方能在历史上有其独立的地位。其三是篇目设置归类不当，层次间逻辑关系混乱。二轮

志书结构分类一般有大编体、中编体和小编体。一些采用大编体式的市、县（区）志，往往在经济发展上投入笔墨过多，造成“将军肚”，使篇章之间容量失衡。而采用小编体式的县志，一级类目过多，有的县志列到 30 ~ 40 个，分类过细过于零碎。另外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同一类志稿有的门类按大编体式设置，有的门类却又按小编体设置，不能一贯到底使用某种体例。还有相当一部分志书篇幅过于庞大，只注重“大而全”，覆盖面广，而缺乏必要的深度，看上去文字不少，可多为承上启下铺垫过渡性内容，核心资料被冲淡。其四是横排纵述仍欠章法。以事名篇，篇下章节目的横排应错落有序，竖写要首尾相连，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内容。所谓的纵，应是以时间为经，以事物本身发展的进程为线索组织材料，反映事物的发展顺序和本来面貌。所谓横，应是以发展的内容为纬，联系历史过程作逻辑分析，找出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的逻辑层次。惟其如此，新编志书才能纵横分见，历史脉络清晰，才可避免平面式的资料拼盘。

察两轮修志的一些志书，在记述事物时只重单独事实，而忽略了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因此造成事物的断裂和与其他相关事项的分割。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 （三）史实方面

地方志书不同于个人的自由著述，应是信史。资料真实可靠，表述资料的

语言、数据也必须真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坚持志书可读性与可信性的统一。编纂中始终坚持认真核查，防止各种“硬伤”。既要防止资料“位移”中失准，又要避免“一直以来、大概、估计、大部分、小部分”等模糊语言。如审阅某志有这样的描述：“建成苏鲁豫皖接壤地区最大的农贸市场”。笔者把几个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大农贸市场的面积数据要来作比较后，发现是编者的估计。对于志书，如此的估计、臆断，将贻害不浅。这样的情况，在已经出版的两轮志书中不排除仍有。

此外，要认真核准和统一统计数字。一部志书尤其是经济部类志书，由大量统计数字和统计图表来说话，这是重要的资料。对于统计数字和统计图表中的数据，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入志的数字要准确。从各种渠道来的统计数字不一定都准确，由于位移、计算的错误，可能造成不真实。如果把那些不真实的数据写入志书，就会削弱志书的权威性。二是不能相互矛盾。常见的问题是分项数据与总计数据、同一个事项的数据前面与后面相抵牾，这就造成了质量问题，给读者带来疑窦。譬如有志书这样描述：“本县工业总产值1980年为100亿元，1985年增加到150亿，年递增10%。”从这段字义看，这个县的工业总产值，5年内平均每年增长10%，但不是递增10%。若年递增10%，1985年的工业总产值，应是161亿元。因此，在总纂时

必须反复审核，决不能把不准确的数字写入志书中。三是入志的数字要一致。一部志书由各系统各部门参加编写，统计数字是用不同方法计算出来的。如果同一问题的统计数字各部志书记载不一致，分不清哪个正确，势必影响志书的科学性、资料性和真实性。为避免差错，总纂时一定要对所有统计数字进行核对，发现矛盾要认真找出原因。各部门与统计局数字不一时，要以统计局的数字为准。同一概念要求的数字要一致，不同概念要求的数字要精确。

#### （四）语言方面

语言包括词语的准确运用和语言风格两个方面。由于编写上的“众手成书”、总纂者文字素养的各异，也导致了两轮修志语言质量上的参差不齐。

一部高质量志书的语言应做到：一是准确，无语法毛病。二是朴实，行文要摒弃浮词，切忌空话、大话、套话，更不允许说假话。有些志书带有浓厚情感色彩的宣传词语，如记载人物，说某人死后“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记地方历史，用“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讲成绩就用“举世瞩目”“突飞猛进”“扶摇直上”等；还有些志书常用形容词和副词，或喜欢发表空泛议论，空话、大话和套话累牍。三是简洁，修志崇尚叙事简洁，文字精练。古文的“文约事丰”很值得我们研究。四是流畅，在讲究严谨、朴实、简洁的基础上重视文字的优美、流畅。李铁映早在全国地方志第二

次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志书一定要可信、可用、可读。”“可读，要写得精炼、优美，引人入胜。读志如看画听乐，爱不释手。文字水平要高。不少名史、名志都是优秀文学著作，影响深远。”

由于我们有些修志者多从秘书、记者编辑、教师、文化工作等部门转行而来，因此在一些志书里行文多带有工作总结、教科书、新闻报道、论文等表述方式，很为“顽固”。如有志稿工作总结式的表述：“一、抓好新《土地管理法》的宣传，不断增强全社会耕地保护的意识。耕地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只有动员全社会参与，才能取得成效。近年来，省各级国土部门认真做好对‘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和新土地管理法以及国家有关耕地保护政策法规的广泛宣传工作，要求做到‘三个讲清’，即讲清耕地保护是由省情、市情、县情所决定的，讲清……”有教科书式描述：“商品的本质属性是价值，而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不仅由价值决定，也受供求关系影响，反过来影响价值的分割，调节市场的供需，因此，价格是市场的信号灯，是商品经济不可缺少的调节器，离开价格机制，就谈不上什么商品经济、市场经济。”

不复例举。这些，在三轮再修志时都要力戒。

## 二、当前志稿评审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法

地方志的独特体例，决定了志书评审必具很强的专业性。评审者的专业程度与专业水平高低与否，直接影响着志稿的修改质量乃至成书质量。

### （一）评审自身质量有待提高

顾名思义，志书评审即对志书的评议审查。这样，就明确了评审者与被评审者的地位和关系，同时也意味着，评审者的专业水平应高于志书编纂者的水平。由所处的地位所决定，当前省、市、县（区）三级志书评审人员组成的一般模式为：由上一级乃至更上级的方志机构组成对下一级乃至更下级志书的评审，评审人员基本为上级机构的成员，普遍的为老中青三组成。但是，以当前评审人员的综合专业水平察之，新编志书修志 40 余年，因迄今国内尚未有哪所大学开设过地方志学科，全国省、市（自治区）、县（区）的三级地方志编纂机构的在编人员尚无科班出身，不少是行政管理人員及其他行业部门人员调入，或高校毕业生充实其里，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导致地方志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佼佼者寥寥。但修志界有这样的现象，修志经验和水平与修志工龄有一定关系，愈老经验愈丰富，道业越老道，这是个不成为结论的结论。

鉴于此，评审常常有这样的现象，由于所处上一级机构的地位所决定，年轻的人员评审资深人员编纂的志稿；修志仅数年的人评审修志 30 多年人编纂的志稿；曾经是学生或部下的人评审老师

或领导的志稿。很容易就造成机构的地位取代了专业能力,这是个弊端和失衡。因此,在志书评审中也出现一些居高临下、缺乏审慎斟酌、没认真衡量志稿优劣的情况,从而导致评审存在着是否中肯的问题。如,某省在评审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村志时,对于志书收录村里经济实体的章程,有年轻评审者提出“章程编纂的没有趣味性”。章程不可能改编,充其量只能缩略摘录,而且章程是个严肃的文本,何谈趣味性?同是这个志稿,文中叙述有“九龙海战取得鸦片战争前夕海战的首仗胜利”(1839年9月4日),还是这位年轻评审者质疑:如此说海战,还就应有陆战?言下之意鸦片战争没有陆战。这其实涉及到历史常识,不妨翻阅史书,史上“三元里抗英”(1841年5月)乃鸦片战争时期广州人民自发的武装抗英斗争。如今50岁以上的人皆知,它还曾上过电影银屏。又如某村志评审,有已退休的该区地方志办领导人在评审时提出“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中的“解体”一词说法不对。查《辞海》,对解体一词的释义之一是瓦解,“人民公社解体”,中央、国家文献皆这样表述,当今志书用之又有何奇哉?

由此引及“一桶水和一碗水”理论。教育界有个传统理念:欲给学生一碗水,老师必备一桶水。在志书评审与被评审的问题上,我们姑且以评审者为老师,被评者为学生。试想,如果师者的历史知识和专业水平如此,又何以传道授业

解惑?

此外,志书评审还存在着是否有其标准以及标准是否适用的问题。一部志书洋洋百万乃至数百万字,评审该从何入手?从更大的范围反观两轮志书的评审,自2008年9月中指组(今中志办)发布《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后,地方志工作才算有了一个质量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但仍缺少专门针对志书评审的细则标准,因此一、二轮的志书评审鲜有明确的科学的评审细则作为依据,大都是评审者按各自的理解认识进行点评,无标准或标准不一,弄得被评者不知所措。

## (二) 志稿评审的四个标准

笔者认为可以“宏观中肯,微观具体;同类一系,点上明晰”为志书评审的参照。

宏观中肯,微观具体。意即对于大的整体上的问题,所提的意见应切中要害或扼要恳切或恰到好处,以理服人,切莫模棱两可,让被评者云山雾罩,不明就里,不得其要。常有人这样对志稿评价:“政治观点表述有问题,通篇体例不够规范……”,如对于改革开放,评审者只提出:“表述上有问题,不符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指导思想”,仅此一句话,让人不明其要,无从修改。如果对志稿指出:“全文全是成绩,看不出一丝的经验教训和波折,应一分为二的表述成绩和失误。”这样点评,被评者就会明白,志稿的确是只有成绩,没谈失误。改革开放成绩固然是主流,但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点波折,

其理不言自明。至于微观问题，要避免以官话、套话评之，问题要明晰，点评应到位，给被评者以具体的可操作性。如有志稿叙述：“1950年4月，县委和县政府组织工作组深入各区、乡，结合清匪反霸，开展减租退押运动，按军政委员会的减租退押条例，从解放之年起，一律实行‘二五’减租，即在原租额上减百分之二十五。在1950年6月之前，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佃户，按规定要地主富农退回农民1949年交租额的百分之二十五，经过‘二五’减租后，其租额仍超过土地正产物千分之三七五者，则再减，地主富农不得违抗”。原稿这段话很像是某个政策文本上的摘录，如果评审者仅仅指出“以文本代替事实，不符志书语言”，则有些官腔官调。如果指出“这段话主要是政策的体现，太空洞，应该主要叙述本县执行的实际情况，包括退租的具体做法和数量等”，被评者即会心神领会，无需赘言。

同类一系，点上明晰。意即对同一类问题，在一次评审会上，所有的评审者不必都一一道来，如文中虚词“的、了、以、在、而、所、与”等过多，去之并不影响文意，不必每有每人必评，仅举例一二，达到举一反三之目的即可，以节省会议时间。但对于个性的问题点，则以明确点到位最好，否则被评者尚不知在通篇何处。如某志叙述：“旧社会，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明显的缺谓语。如评审者只提出：“××章

××节中语句、措辞有问题”。不如直接挑明问题所在，标明在某页某行自己认为应改为：“旧社会，劳动人民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加“过着”二字即直接将问题解决，这样，被评者还很愉悦接受。

### （三）评审方法改进琐谈

志书几十年的评审，已然形成一种定式。评审的程序为初审（内部）、复审（部门）、终审（上级）。这对志书质量的把控有重要作用。但现行的评审方式也存在不足，一是有些地方无评审标准以及虽有标准但科学性不强；二是组织上知识结构组合单一，多为从事方志人员；三是方法上如评审人员构成、会议程序及会议的日程上有待改进。

评审标准的建立。评审标准乃评价志书质量的准则，评审标准的建立，应从政治标准、体例标准、史实标准和语言标准四个方面来考虑。关于评审的政治标准，以往我们多在凡例中这样标述：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此作为一部志书编纂上的政治尺度，但这只是宏观的笼统要求，相应的还须拟定细则的政治要求，便于评审的可操作。建议可分别向党委、政府等各部门征求意见而后确定评审标准。评审的体例标准，应从严守志界、横排纵写、“七体”并用、

述而不论等方面拟定出较细的可操作的条款。评审的史实标准，应从如何核准甄别资料、文字、数据的真伪上拟定出较细的可操作的条款。评审的语言标准，应从严谨、朴实、简洁、流畅、规范上拟定出较细的可操作的细则。

评审人员的构成。一部官修综合志书，除其体例、章法、结构、语言外，还涉及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人物等几大版块及诸多的事项，每位评审者不可能对每个事业事项都很专业，因此应专业对口，有针对性的评审。鉴于地方志的独特体例要求，不必拘囿本级方志机构的人员，应广邀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方志老专家参与评审。此外，针对史实的评审，一般外人对当地的历史事实多不清楚，最好邀请一二“本地通”，专事对史实评审把关。

评审方法的改进。首先人员应有控制，分工有专，分别把关。分别把关

可采取一般评审人员可一二或数人重点评审某一篇或某一个版块，兼及其他；少数资深方志专家可通评全篇。分专业把关应从政治关、体例关、史实关、语言关分别把守。一般市级志书评审以二三十人为宜，县（区）级志书评审最好控制在20人以内。其次，评审时间的掌控也是评审会需改进的地方。一是总的的时间要掌控。当下社会生活步伐不断加快对时间的节控很为重要，一部市志充其量两天的评审足矣，一部县（区）志最好控制在一天；二是每位评审者的发言时间要严格掌控。评审者有书面意见，评审会上摘其要点讲述即可。通过努力，使评审会精简而有效果。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北市地方志办公室 退休）

责任编辑：陈伟



## 同治《荣昌县志》文献价值论

滕新才

[同治]《荣昌县志》22卷，文康修，廖朝翼纂，同治三年（1864）九月中旬开局，至同治四年（1865）四月下旬竣工，历时7个多月成书，详分44门附5门，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

### 一、体例周全

体例者，成规惯例也。大而治国理政的纲领制度，小而文章著作的编写格式，凡属人所共遵的模式，皆谓之体例。古人撰述，首重体例，犹国之朝纲、衣之领袖。南宋校讎学家郑樵（1104—1162）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sup>[1]</sup>故研读古书，理应先明体例，否则，“不知古人著述之体例，而欲论古书之真伪”，其流弊就如同“执曹公之律令以案肃慎氏之不贡楛矢，先零之盗苏武牛羊也”<sup>[2]</sup>，拿本朝的剑斩前朝的官，那是非常荒唐的。

清朝为确保《大清一统志》的纂修质量，非常看重各省《通志》的编著体例。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同治]《荣昌县志》封面

钦差河南巡抚贾汉复（1605—1677）得风气之先，于顺治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1658年4月30日）发布《修志信牌》，这是河南“全省范围内颁布的第一个修志文件”<sup>[3]</sup>，敦促各府、州、县积极修志，

<sup>[1]</sup> 此处比喻出自《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出兵北征乌桓，孔融嘲讽说：“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

“务使缺略咸辑，今昔备载”<sup>[4]</sup>。并于顺治十七年（1660）五月纂成《河南通志》50卷，约130万字，“凡山川之修阻，人物之烜赫，文艺之菁英，以及舆图、星纬、城池、疆域、田赋、户口、风俗、物产、祠祀、古迹之属，试一展卷，瞭如指掌”<sup>[5]</sup>，上报朝廷，得到嘉奖。康熙元年（1662），贾汉复调陕西巡抚，仍汲汲于修志，仿《河南通志》体例，于康熙六年（1667）又撰成《陕西通志》32卷、首3卷，约200万字。这是清代最早完成的两部省通志，成为各省修志的样板，“康熙初年，前抚臣贾汉复……尝抚豫，再抚秦，其所撰两省《通志》，朝议取为他省程式”<sup>[6]</sup>，“颁

诸天下以为式”<sup>[7]</sup>。康熙二十九年（1690），河南巡抚阎兴邦（1635—1698）为保证各府州县志体例统一，特颁发《修志牌照》，详列凡例23条，凡总图、沿革、天文、四至、疆域、河防、乡镇、公署、桥梁、仓库、社学、街坊、山川、古迹、风俗、土产、陵墓、寺观、赋税、职官、人物、流寓、孝义、列女、隐逸、方伎、艺文、灾祥等等，无不罗致其中，明确规定编辑门类和写作体式。在此背景下，全国地方志都采用康熙帝钦定的门类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所损益，代代相承，沿至晚清。[同治]《荣昌县志》也就是在这种修志传统下诞生的。

表1 [同治]《荣昌县志》与《大清一统志》、钦定省志类目对照表<sup>①</sup>

大清一统志	顺治河南通志	康熙陕西通志	同治荣昌县志
图表	图考	图	星野图（步天歌、井鬼二星、杂座考附）、地輿图、县城图、学宫图、县署图、八景图
分野	星野（祥异附）	星野、祥异	祥异
建置沿革	建置沿革	建置沿革	建置（沿革附）
形势	疆域（形胜附）	疆域（关隘附）	疆域（形势附）
山川	山川（关津、桥梁附）	山川（津梁附）	山川
风俗	风俗	风俗（土产附）	风俗
土产	物产		物产
城池	城池（兵御附）	城池	城池（场集附）
	公署	公署	公署（行台、官厅、养济院附）

①据巴兆祥《方志学新论》改制，原表3—4列为康熙《江西通志》、乾隆《沧州志》，今改为康熙《陕西通志》、[同治]《荣昌县志》。

表 1 续

大清一统志	顺治河南通志	康熙陕西通志	同治荣昌县志
学校	学校（贡院、书院附）	学校	学校（书院附）
	选举（武勋附）	选举（武宦附）	选举
职官	职官、封建	职官	职官
户口	户口		户口
田赋	田赋	贡赋、屯田	田赋（蠲赈附）
古迹	古迹（寺观附）	古迹	古迹、坊表
关隘			关隘
津梁			津梁
堤堰	河防	水利	
陵墓	陵墓	陵墓	冢墓
寺观	祠祀	寺观	寺观
名宦	名宦	名宦	名宦
人物	人物	人物	
流寓	流寓	流寓	
列女	列女	列女	列女
仙释	仙释	仙释（方伎附）	仙释
	帝王（后妃附）	帝王（后妃、封建、窃据附）	
	孝义	孝义	孝友
	隐逸	隐逸	隐逸
	方伎		
	艺文（御制、赋、诗、表、笈、疏、颂、书、启、赞、箴、论、辩、说、述、传、序、记、檄、移文、议、跋、碑记、铭、诔、吊文）	艺文（礼乐射御书数、御制、诗、赋、箴、诫、铭、颂、赞、疏、表、策、议、论、序、碑、记、传、书、考、说、辨、跋、檄、行状、墓志、墓表、诔、祭文、杂著）	艺文（疏、记、序、碑、传、说、辨、牒、帖、书、启、引、铭、杂记、赞、志、诗、词、乐府、古风、典籍）
	杂辨（备遗附）	杂记（鉴戒盗贼附）	外纪
			祠庙（祀典附）
			政绩

表 1 续

大清一统志	顺治河南通志	康熙陕西通志	同治荣昌县志
			宾兴
			兵防（驿传、塘铺附）
			仓储
			盐法
			成均
			宦迹（乡宦附）
			忠节
			行谊
			耆寿（耆儒附）
			封荫
			戎事

从上表可以看出，全国《一统志》、钦定省通志设置的类目，[同治]《荣昌县志》基本上应有尽有。所缺者惟堤堰（河防、水利）、帝王、流寓、方伎四目，盖因荣昌历史上既无特大洪涝灾害，亦无重要水利工程，既无技压群雄的艺人，亦无外来流寓的名贤，更乏龙飞九五的帝王，据实直书，不事夸耀，史家笔法也。无专门的《星野》目，据《大清一统志》揭示，重庆府为“井鬼分野，鹑首之次”，荣昌“地属渝郡，野应星躔”<sup>[8]</sup>，这部分内容体现在卷一《星野图说》《地輿图说》中，将图考与天文、地輿相关内容紧密结合，一目了然。无专门的《人物》目，重要人物的传记，除已有的《职官》《名宦》《选举》《孝友》《仙释》《列女》

《隐逸》7目外，新增《政绩》《宦迹（乡宦附）》《忠节》《行谊》《耆寿（耆儒附）》《封荫》6目，其中卷十一《宦迹》版心明确刻为“卷之十一《人物·宦迹》”字样，也就是说，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正是对应《一统志》、钦定《通志》的“人物”门，本县志并无缺漏。其他新增类目，多是高明的创新。如《祠庙》目，记文庙、崇圣祠、关帝庙、城隍庙等祠庙30座，更重要的是附录《祀典》，详载文庙祭祀典礼，从大成殿孔子正位，到东西“四配”颜回、孔伋（子思）、曾参、孟轲，东西“十二哲”闵损、冉雍、端木赐（子贡）、仲由（子路）、卜商（子夏）、有若、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东西庑先贤公孙侨（子产）、蘧瑗（伯

玉)等79人,东西庀先儒公羊高、谷梁赤等61人,崇圣祠孔子父亲叔梁纥以上五世祖正位及东西配、东西庀先儒,每年仲春二月、仲秋八月上丁日释奠仪式、祭品、礼器、乐章、笛谱、舞谱,名宦祠、乡贤祠、忠义祠、节孝祠、关帝庙、文昌宫、先农坛、社稷坛、神祇坛、火神庙等祭祀仪注、祭品、祝文,娓娓道来,不厌其繁,巨细无遗。如此煌煌盛典,岂止一个荣昌县的《祀典志》,简直就是清代整个中华大祭祀的《典礼志》。

与经济、军事相关,新增《仓储》《盐法》《兵防》《戎事》四目,书中叙写作缘起曰:

上世不言有无,无所谓积储也。自《周官》始有仓人、遗人之掌,而仓储昉焉。汉耿寿昌仿李悝平粟法立常平仓而无社仓,朱子立社仓而无义仓。唐、宋、元以仓储为军国之需,宋南渡更恃为边餉之助,非所以济民艰而勤赈贷也。我国家损益旧章,法良意美,仓教所设,上足以舒国用,下足以济闾阎,诚万世不易之规也。作《仓储志》。<sup>[8]</sup>

《禹贡》:青州贡盐、絺。《周礼》:盐人供其苦盐、散盐、形盐、饴盐。至《管子》官山府海,而鱼盐之利遍天下矣。邑中井灶无多,而分引采配,盐政交通,民皆不病于食。仰见我朝斟酌损益,截长补短,皆得其宜,以视元之置局鬻本,明之减运输银,相去远矣。作《盐法志》。<sup>[8]</sup>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无备。周重检阅之典,汉屯南北之军,皆所以

严捍卫而固藩篱也。荣邑接壤平原,无高山大泽之险以为关键,要在谨缮完,密防守,不弛武备焉。我国家诞敷文德,载绩武功,寄驻防而守御,飭汛弁以巡逻,而又团练相维,塘驿交警,洵乎长治而久安之规也。作《兵防志》。<sup>[8]</sup>

旧志有兵防而无戎事,兵防简阅于承平之日,而戎事则征战于乱离之时。咸丰庚申(1860),滇贼跳梁,窜我县境,都人士集团防剿,百战勤劳。更有司牧儒官,秣马蓐食,率七十生徒之众,领六千君子之师,擐甲胄而复危疆,飭戎车而剪丑类,卒能戡乱善后,攘御荡平。其义士忠臣捐躯报国者,或邀朝廷之恤典,或与庙祀之蒸尝,是皆足以振颓风、光乘史。张子房之帷幄,今再见焉;马伏波之功名,洵足志矣。作《戎事志》。<sup>[8]</sup>

此四目详载全县常平仓、监谷仓、义谷仓、社仓储粮细目,域内盐井及所配盐引数额,驻军兵制及驿传、塘铺实情,皆系国计民生要务,所关至大至重,断不可轻忽。其中《戎事志》专记咸丰九年(1859)云南李永和、蓝朝鼎义军进攻荣昌,本县部署防御、组织民团抵抗及守备祝良芳阵亡界石场等战况,万余言,“记述甚为详尽,有较高史料价值”<sup>[9]</sup>。

与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相关,新增《宾兴》《成均》二目,写作宗旨亦有明白交代:

古者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献贤能之书于王。汉高命酈侯,有意称明德者为之劝驾,

署行义年；武帝诏《议不举孝廉者罪》。宾兴之典，历代相沿。荣邑多士如云，穷经待用，乡会两试，踊跃争先，冀奏赋以登龙，望长安而走马。贤人君子，合志金谋，为赠朱提，期登蕊榜。庶几大罗天上咏霓裳，而继继承承；紫薇苑中夺锦标，而师师济济。作《宾兴志》。<sup>[8]</sup>

古者司徒典乐，宗伯掌礼，聆辟雍之钟鼓，聚圜桥而观听。汉唐以来，观经鸿都，讲学石渠，课其道艺德行，荐入成均、国子，甚盛事也。邑自宋明之世，掇拾青紫、擢登甲第者，更仆难终。我朝朴棫多材，科名竞爽，而或遗珠有憾，未售卞和。或与岁荐之条，或膺拔萃之选。副贤书者，与邀甲乙；援国例者，亦厕冠裳。皆分贡树之香，咸入缙绅之列。用庐姓字，矜式国人。作《成均志》。<sup>[8]</sup>

观此两目，可明察州县宾贤兴能之意，考知明清两代荣昌恩贡、拔贡、岁贡、副榜诸君及其仕历，丰富了科举制度史的研究内容，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要之，[同治]《荣昌县志》体例周全，除《大清一统志》、钦定《河南通志》《陕西通志》必备门目外，新增类目皆高屋建瓴，措置有度，一方面固然是随着历史演进，清代方志学理论思维和实践操作更加成熟；另一方面也与主局者识见洞达密不可分，如总裁文康就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邑之有志，犹古列国之有史。为治者考古证今，凡因革损益，皆于志是赖……荣昌虽非剧区，而与泸州、隆昌、大足、永川、安岳、内江接壤，

又系驛使往来要冲，下车日，不仿朱子知南康军询郡志之意，亟取邑志观之，乌能得其端绪？”<sup>[8]</sup>故于修志高度重视，事无巨细，皆身体力行，这些敢于担当、实心任事的品质，也是[同治]《荣昌县志》圆满成功之坚强保障。

## 二、内容丰赡

[同治]《荣昌县志》修成后，文康严肃反思，“敢云彬彬乎信史哉？亦以分所应为，时所得为，心所欲为，不敢自暇逸耳。然此非独为居官者计也，实于邑之人有厚望焉。盖国家之深仁厚泽，山川之毓秀钟灵，士农之富贵联绵，善良之子孙发达，以及忠孝节义之姓名彪炳，流芳百代，俱可于志一一征之”<sup>[8]</sup>，简明扼要概括了全书的主要内容。

本志叙荣昌县建置沿革、疆域形势、城池场集、山川关津、户口田赋、仓储盐法、学校书院、公署兵防、风俗物产、寺观古迹等，皆方志要义，中规中矩。《职官志》记唐代昌州刺史、昌元县令 8 人，宋代昌州知州、判官、昌元县令 8 人，明代知县 61 人、县丞 50 人、主簿 45 人、典史 37 人、教谕 6 人、训导 7 人，清代知县 78 人、教谕 27 人、训导 4 人、典史 26 人、驻防把总 32 人、驿丞 5 人，其中卓有政绩、“功德在民”“题请从祀”的名宦，有唐代昌州刺史段建中、合州刺史兼渝合资泸经略安抚使赵延之、昌普渝合刺史兼昌元县令韦君靖，宋代昌州知州单煦、陈仲道，明代知县薛大亨、张瑛、邹玺、闵宗圣，教谕李锐，

共 10 人；此外单独入《政绩志》的长官，有北宋昌州知州葛宫，明代知县胡献金、光时亨、王履台，清代知县王濂、蔡毓祥、史彰、许元基、郭成巍、朱毅、薛谐律、李基善、汪□若、李光谦、周春溶、蔡天藻、龙翔、张履实、曾灿奎、孙濂、奎鹤、宋恒山、麟勋、饶宪章，教谕寇宗，共 25 人。他们的小传，绝非溜须拍马的浮词，而注重“有实心实政、文事武功、卓卓口碑”<sup>[8]</sup>的业绩。如周春溶（1766—1827），字雪园，又字已村，绍兴府诸暨县（今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人。乾隆六十年（1795）优贡生，充八旗官学教习，以知县分发四川，先后署平武、资阳、荣昌、南溪等县知县，后任甘肃平罗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知县。嘉庆二十三年（1818）署理荣昌知县期间，有感于本地民俗勤力农耕，但不重视蚕桑，乃于公务之暇，辑撰《蚕桑宝要》一书，分栽桑法则、育蚕事宜、育蚕避忌、育蚕器具四部分，于当年刊行，分发士绅百姓，大大普及了蚕桑知识和种养技术。同治十一年（1872）重刊，川东兵备道特此晓谕军民人等“农桑并重”，其书传存治今。因此，这些名宦在荣昌任内的政绩，就组成了一部简明扼要的古代荣昌政治史。

《选举志》记宋代进士 20 人（仅南宋乾道中就多达 14 人），明代进士 15 人、举人 77 人、孝廉方正 1 人，清代进士 6 人（其中恩科进士 1 人、武进士 1 人）、举人 38 人（其中恩科举人 1 人、武举人

11 人）、孝廉方正 2 人，《成均志》记明代恩贡生 3 人、拔贡生 8 人、岁贡生 151 人、副榜举人 1 人，清代恩贡生 24 人、拔贡生 10 人、岁贡生 94 人、副榜举人 3 人。进士、举人、贡生数额的逐渐减少，说明科举制度经隋唐创立，经宋代空前重视文治和文人地位，到明清两代“八股取士”，已逐渐走向没落，不能再为国家选拔真才实学，所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废除科举制度，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治]《荣昌县志》的记载，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发展道路完全相符。

《耆寿志》《列女志》《孝友志》《行谊志》记荣昌籍 60 岁以上长寿老人 872 人（含耆儒 41 人），其中耆老 470 人、寿妇 402 人。耆老 100 岁以上 15 人，最长寿者 102 岁（陈文德、薛儒翔）；寿妇 100 岁以上 17 人，最长寿者 104 岁（汤叶氏）。吕乾明、周大恺身见六代，其余五世同堂者 70 人，四世同堂者 12 人。耆老多性情端谨，为人诚朴，洽比乡邻，排难解纷，乐善好施，耕读传家；寿妇特别是其中的节妇，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凄美的故事，矢志守节，孝亲抚孤。其中既有朝廷重臣，更多齐东野老，如耆儒喻茂坚，秩登二品，位至八座，是德高望重的佼佼者。

喻茂坚（1474—1566），字月梧，号心庵，荣昌人，祖籍南昌府丰城县（今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正德二年丁卯科（1507）四川省乡试第 12 名举人，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三甲第 32 名进士，

与杨慎同榜。宁波天一阁保存了一份珍贵的科举档案：

喻茂坚，贯四川重庆府荣昌县，民籍。国子生，治《易经》。字汝砺，行三，年二十七，三月十三日生。曾祖宗智。祖志善。父洪□，母姚氏，具庆下。兄茂英、茂盛。弟茂高、茂崇。娶郝氏，继娶吴氏。四川乡试第十二名，会试第八十六名。<sup>[10]</sup>

从这份档案中可以推知以下信息：第一，喻茂坚生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合公元1485年3月28日，金榜题名时27岁。这个时间是否可靠呢？喻氏家族文献披露：“少保茂坚祖，字月梧，号心庵……生明成化十年甲午二月初三日。”<sup>[11]</sup>合公元1474年2月18日，相差11年，中进士时38岁。孰是孰非？喻茂坚自己最有发言权。他为祖父喻志善亲撰墓志铭，开宗明义说“不肖孙男茂坚，乃皇上纪元嘉靖之二十有八年己酉冬，以刑部尚书恳乞休退，钦奉温旨，致仕家居者八载于兹”，即嘉靖三十五年(1556)，“念坚八十有二”<sup>[18]</sup>，由此可证，喻茂坚生于成化十年是正确的，《登科录》时间有误。

第二，喻茂坚的户口类型属荣昌县民籍，学历背景是国子监生，科举路径为专攻《易经》，以否极泰来、尚节敦敬的抽象思辨见长，这为他以后出任刑部尚书、处理大量刑狱司法案件奠定了

深邃的哲理思想基础。

第三，喻茂坚曾祖父叫喻宗智，祖父名曰喻志善，父名洪□，缺一字。据喻茂坚同科状元杨慎(1488—1559)透露，喻茂坚“曾祖曰宗祥，墓于丰城，乡曰丰西；祖曰志善，父曰洪深，母氏曰姚”<sup>[12]</sup>。喻茂坚亦自称“曾祖考讳宗祥，妣王氏，墓在丰城西乡八十四都南神桥梧冈村，坚曾一一恭谒，建有牌坊”，则《登科录》所记“曾祖宗智”有误。祖父喻志善，字有符，号启庆，喻氏入蜀始祖<sup>[13]</sup>；祖母吴氏。父喻洪深，《登科录》缺“深”字，喻志善第三子，字不详，号石峰；母姚氏。按照古代封荫制度，他们从喻茂坚担任福建按察使起，就陆续接受朝廷诰命。嘉靖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1539年7月14日)，敕赠喻志善、喻洪深为通议大夫、福建按察使；赠吴氏、姚氏为淑人。嘉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544年12月9日)，敕赠喻志善、喻洪深为通议大夫、刑部右侍郎；吴氏、姚氏仍赠淑人。嘉靖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1549年7月6日)，敕赠喻志善、喻洪深为资政大夫、刑部尚书，吴氏、姚氏俱加赠夫人<sup>[11]</sup>。

第四，正德六年喻茂坚中进士时，喻洪深、姚氏均健在，故档案履历曰“具庆下”。

第五，喻茂坚排行第三。上有长兄喻茂英，生一子喻礼；次兄喻茂盛，生一子喻裙；下有四弟喻茂高，生一子喻禄；

① 《中华喻氏通谱》第一部上册著录该碑，题为《明诰赠资政大夫刑部尚书启庆喻公墓碑铭》，落款作“不肖孙男茂坚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仲冬吉日立”。



五弟喻茂崇，生一子喻祉。

第六，喻茂坚元配为郝氏，继妻为吴氏。嘉靖十八年，郝氏赠淑人，吴氏封淑人，说明郝氏已故，吴氏尚在。嘉靖二十三年，郝氏、吴氏俱赠淑人，说明此时吴氏亦已去世。嘉靖二十八年，郝氏、吴氏俱加赠夫人。此外，喻茂坚还有继室王氏、“今室”徐氏，无诰封。其中郝氏生子喻福、喻祐、喻禎；吴氏生女闰莲；王氏生女恒莲；徐氏生子喻祐、喻禎。五个儿子都以父亲为榜样，紧扣喻茂坚的“月梧”取表字。长子喻福，字不详，恩荫监生，授迪功郎，娶周氏，生五子：喻应鱼、喻应龙、喻应鹤、喻应翰、喻应梦。次子喻祐，字怀梧，贡生，任溧阳县（今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县丞，娶刘氏，生二子：喻应登、喻应良。三子喻禎，字述梧，贡生，任汉阳县（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知县，娶王氏，生二子：喻应豸、喻应台。四子喻祐，字肖梧，恩贡生，官黎平府（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知府，娶周氏，生一子：喻应彭。季子喻禎，娶文氏，生三子：喻应梅、喻应楠、喻应桐。光绪十四年（1888）重刊本《喻氏族谱》记喻祐为“嘉靖丁亥岁（1527）进士”，喻禎为“嘉靖己丑岁（1529）进士”，但《会试录》《登科录》《进士题名碑录》都查无实据。会试每三年一科，明世宗继位后，于嘉靖二年癸未科、嘉靖五年丙戌科、嘉靖八年己丑科殿试，嘉靖六年丁亥岁根本不开科，纯属子虚

乌有，故不可信。

第七，正德六年礼部会试，喻茂坚中第86名。辛未科主考官为礼部尚书费宏（1468—1535）、礼部左侍郎毛纪（1463—1545），都是“学行纯正，才猷弘远”<sup>[14]</sup>“起家文学，致位宰相”<sup>[15]</sup>的元老重臣。第一场，《易经》考题四道：1.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2. 上九，白贲，无咎；3. 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4.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第二场，论一道：周公思兼三王；诏咨表三道：拟汉明帝幸辟雍行大射养老礼诏（永平二年），拟唐以姚元之兼紫微令诰（开元二年），拟赐《历代通鉴纂要》谢表；判语五条：讲读律令，收养孤老，乡饮酒礼，优恤军士，修理仓库。第三场，策问五道，一问：“帝王得天下，虽本于德，然其始也，亦必有人民、土地以为之资。故宽仁如汤，必以七十里而隐括九围之式；圣敬如文，必以百里而造端方国之命，此皆著之经史而可稽者也。而亦或有不然而者，如汉高帝以泗上亭长，自一剑之外，无长物也，卒以创西汉兴王之业。世祖虽以帝室之胄，自一牛之外，无余资也，卒以成东汉中兴之功。岂二帝之贤，有过于汤、文者乎？”二问：“自三代后，其享国久长者，曰汉、曰唐、曰宋。虽其创业垂统，不能尽同，然一代制作，皆足以承天命、结人心，要必有道可继也，而不能无惑焉。汉高画一之法，文、景守之而治。孝武变之，则海内虚耗矣。

胡昭宣再变，乃有吏称民安之效？宋室忠厚之规，真宗守之而治。神宗变之，则天下多事矣。胡元祐再变，乃有旋乾转坤之功？”三问：“世称唐宋大儒，必曰韩退之、欧阳永叔。其所期与其徒推尊之者，盖非特文章之妙，其道学固可尚也。然则其起八代之衰与变一代之习者，果以文乎？抑以道乎？退之尝叙道统之传，终之曰：轲死而不得其传焉，程子亟称之。永叔论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者，朱子尤有取焉。至宋景文、曾子固之所称，乃有不同，何见之异欤？抑其所谓以是相传者，竟为何事，而一之云者，果在于所传之内否欤？”四问：“古之为政者，必本之以仁义，而辅以宽猛。岂不以仁义乃出治之本，而宽猛实济时



《中华喻氏通谱》喻茂坚像

之具者乎？尝稽诸往牒，而亦有可疑者。如尊尊亲亲，周公治鲁之政，仁矣；至其后世，乃有怠缓浸微之忧。举贤上功，太公治齐之政，义矣；至其后世，乃有急迫争夺之祸。夫仁与义，皆三代已行而有效者也，而齐鲁行之，皆不免于弊。岂仁义之治，徒宜于三代，而不宜于齐鲁者乎？”五问：“天下太平，治之极也，而君子有忧焉。怠荒之戒，盖拳拳而不容已。观之虞廷，则可见矣。后之名臣，何莫不然。故有当汉文之时，而进《治安策》者；当晋武之世，而著《徙戎论》者；有当仁义既效之后，而陈十渐以规之者；有当励精政事之初，而举十事以要之者；有志切先忧，而条十事以答天章之问者；有明炳先见，而疏十事以沮元丰者。其言虽殊，其为保治计一也。然则政固有异道邪？将亦各因其所急而图之邪？使当时尽用其言，果有益于其治否邪？”三场考毕，中式进士共 350 人，喻茂坚名列第 86 名。

第八十六名：喻茂坚，四川荣昌县人，监生。《易》。<sup>[16]</sup>

正德六年三月十五日（1511 年 4 月 12 日），明武宗御奉天殿，亲自殿试，策问进士，确定“天子门生”的身份，喻茂坚录取为三甲第 32 名进士。一甲状元为天下闻名的四川老乡——新都杨慎，与喻茂坚是“三榜五同”（同乡试、同会试、同殿试、同师、同经）的好友，且有姻亲之谊（喻茂坚姑姑是杨慎继母）。三月十八日，文武百官朝服侍班，明武

宗再御奉天殿，鸿胪寺官唱名，礼部官捧黄榜，鼓乐引导至长安左门外张挂，顺天府（今北京市）官员用伞盖仪从送状元归第。三月十九日赐宴于礼部，宴后赴鸿胪寺学习礼仪。三月二十二日，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三月二十三日，状元率诸进士参拜孔子庙，礼部奏请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sup>[10]</sup>。至此，辛未科所有仪典才告结束。

喻茂坚由此踏上仕途，授南直隶池州府铜陵县（今安徽省铜陵市）知县，正德十年（1515）调临海县（今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知县，正德十四年（1519）擢福建道监察御史，嘉靖元年（1522）巡按陕西，历福建按察使、贵州右布政使、浙江右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郧阳，转应天巡抚，总督漕运，嘉靖二十三年（1544）入朝任刑部右侍郎，嘉靖二十七年（1548）晋刑部尚书，正二品，加太子少保衔，明世宗圣谕“喻茂坚乃天下清官也”<sup>[8]</sup>。编纂《问刑条例》，著有《梧冈文集》等。因上疏解救内阁首辅夏言（1482—1548），弹劾权奸严嵩（1480—1567），坚持“墨官可刑，法官不可刑”<sup>[8]</sup>，触怒明世宗，于嘉靖二十八年冬致仕还乡，时年76岁。嘉靖三十九年（1560），亲撰二联垂训子孙：“衍祖宗一脉真传，克忠克孝；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sup>[13]</sup>“事五尺天而天知，存方寸地而地知，为人父母无愧；享千钟粟以粟养，读万卷书以书养，在我子孙自修。”<sup>[11]</sup>勉励喻氏子孙正直

修身，耕读传家，奉公守法，爱国恤民。又倡建尔雅书院，以耄耋高龄亲授课艺，热心培养家乡子弟。多种文献记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好友杨慎来荣修好，喻茂坚时年八十有八，杨慎也已古稀添五，世事沧桑，岁月峥嵘，两位老人感慨万千。杨慎题赠二联：“北斗贯丹心，明刑弼教尚书第；南山颐白发，全节完名上座仙。”“霜肃三台，曾是朝中真御史；星回八面，可为陆地散神仙。”<sup>[8]</sup>光绪十四年（1888）重刊本《喻氏族谱》甚至说还有第三联：“父子祖孙家庆，真符重庆；科名鼎盛世昌，允合荣昌。”按照学术界通常的说法，杨慎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滇南永昌卫（今云南省保山市）戍所，不可能三年后还偷偷离开谪居地，千里迢迢来荣昌探亲。上述三联的真实性和采信度都值得怀疑，特别是第三联，纯粹是为了嵌入“重庆”“荣昌”四字而大搞文字游戏，辞藻和意涵与前两联不啻天壤，故同治、光绪《荣昌县志》均弃置不录。嘉靖四十三年（1564），喻茂坚91岁时，孙喻应台、曾孙喻思恪（喻应豸次子）双双高中举人，重庆知府余龙津致联祝贺：“八座期颐绵鹤算，可称禄位名寿俱全；一科叔侄奋鹏程，更羨子孙曾元媲美。”喻茂坚也抑制不住兴奋之情，自题二联：“帝赐闲身归畎亩，天留老眼看曾元。”“曾祖九旬犹在世，儿孙十八互登科。”<sup>[8]</sup>嘉靖四十五年七月十五日（1566年7月31日），喻茂

坚以 93 岁高龄端坐而逝，御赐葬祭，赠太子太保，祀忠贤祠，墓在今荣昌区万灵镇尚书村。喻茂坚纪念馆现为荣昌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2024 年 1 月命名为重庆市廉洁文化示范基地。

又如耆寿敖时豫，天性孝友，志行高洁。长兄敖时忭任修仁县（治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修仁镇老城）知县，父久病思归，无盘缠返川，卒于异乡。敖时忭丁忧卸职，亦囊中羞涩，滞留桂林；次兄敖时中、敖时和均远游浙江。敖时豫昼夜兼程赶回荣昌，筹措 600 银两，又火速奔赴粤西，扶送父亲灵柩还乡，卜葬江北大龙山，丧葬尽礼。兄弟四人，以敖时豫一人独当大事，所费尤多。三兄各立券偿付，敖时豫坚决推辞：“一子不葬父乎？骨肉之间，安得较量锱铢也？”子敖翊臣，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举人，任澄海县（治今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知县；敖廉臣、敖介臣，皆县学庠生；季子敖京友，举咸丰元年（1851）孝廉方正，同治三年（1864）副榜举人，[同治]《荣昌县志》协修。孙敖册贤，咸丰三年（1853）癸丑科二甲第 34 名进士，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刑部员外郎，迁江苏司郎中，[光绪]《荣昌县志》纂修；敖喆贤，湖南升用知县，署桂阳直隶州（治今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同知。敖时豫享年 88 岁。

明清两代荣昌何以如此多长寿且福

报？检阅全书，不难明白其中道理，自有山川地理原因、物产气候原因、人文环境原因、个人特殊原因。本书《地輿图说》谓“荣邑沃土环瞻，绣壤交错，峙云山之万叠，流溪水之千条”，《山川志》云“荣邑祥钟濑水，秀挹屏山……惟川岳之炳灵，亦人文之特起”<sup>[8]</sup>，《风俗志》言“荣邑民安耕凿，士业诗书，我朝休养生息，康乐和亲，里闾之间，型仁讲让，浸浸乎太和翔洽焉”<sup>[8]</sup>，《物产志》曰“荣昌夙号膏腴，小民各安稼穡，牵车服贾，农桑利益百年；女织男耕，货利丰于列郡，亦守土者之易为敷治”<sup>[8]</sup>，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呼应了前述问题。荣昌得天独厚的山川大势，浅丘起伏的地理布局，河流纵横，提供水源，适于人类生存、生产、生活；土壤肥沃，土质优良，气候暖和，四季分明，温度、湿度恰到好处，适合动植物繁殖，给人类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民俗醇厚，男耕女织，各安本业，古风犹存。然则“长寿荣昌”“宜居荣昌”，不言而喻成为县名寓意“繁荣昌盛”的内涵之一。

《艺文志》收罗最为宏富，辑录疏 3 篇、记 10 篇、序 8 篇、碑 5 通、传 7 篇、说 6 篇、辨 1 篇、牒 1 篇、帖 1 篇、书 4 篇、启 2 篇、引 1 篇、铭 1 篇、杂记 4 篇、赞 4 篇、志 2 篇、各体诗词 138 首、本土文献提要 25 种。收录作品最多的是刘时俊家族，列表统计如下。

表 2 [同治]《荣昌县志》辑录刘时俊家族作品统计表

姓名	身份	诗歌	散文	数量
刘时俊	明朝兵部尚书	早朝、江边独叹、题佛图关、杂兴三首、读刘口佛图关石刻有感、征奢酋喜二子自江南来渝助军、别诗、寄钟伯敬、题石笑斋东岩遗迹兼赠曾笑斋	渝城功过纪略、崇节辨贤说、祛邪反正说、搜根窟说、权使过、均役说、行保甲说、礼送诸贤士牒、致敬汝上舍帖、造庐躬侯张耆儒、候朱仓使大经书、与耆儒皇甫炤书、与耆老平宰书、候曾三尹启	25
刘 泌	刘时俊次子 南明太仆寺卿	至平望驿恭谒先大夫生祠(四首)、闻边警、即席有感、苦风行		7
尹纫兰	湖广参政尹伸之女 刘泌元配	深夜坐吟、乍晴、梅花		3
朱怀琼	德阳王郡主 刘泌继室	塞下曲、落花、麦浪、水中雁字、梦亡夫		5
刘善复	南京五府经历 刘泌长子	道傍古树、冬至、挽歌		3
刘 斌	康熙八年武举人 刘泌次子	过关索岭、秋夜		2

这是一个富于文学才华的家族，生当明清鼎革多事之秋，自觉践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sup>[17]</sup>的文学理论，并将诗文用于反映生活、记录时事。这种爱国忧时的情怀，在刘时俊诗文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刘时俊(?—1629)，字恒甫，号勿所，又号梦胥，祖籍富顺，后迁居荣昌。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三甲第154名进士。初授庐江(今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县令，调桐城(今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再转吴江(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捐俸筑堤80里，以防水患，造福一方，民称“刘公堤”，立

生祠祭祀。泰昌元年(1620)，其子刘泌公干途经吴江平望驿，入祠参观，抚景感怀，赋诗四首，“心手经营地，生平最不忘。去久长相忆，深情如故乡”<sup>[8]</sup>。刘时俊在江南，潜心吏治，勤政爱民，著有《三邑人文》《居官水镜》等书，[同治]《荣昌县志》所录《崇节辨贤说》诸篇，均选自《居官水镜》，弥足珍贵，从中可见刘时俊崇尚乡贤、贬抑邪说、缉捕盗贼、均平徭役、推行保甲、礼遇贤士、致敬监生、拜访耆儒等优秀品质，一个励精图治、礼贤下士的循吏形象栩栩如生。

后刘时俊擢南京刑科给事中，晋太仆寺卿，所在皆有直声。天启元年(1621)，

永宁土司（治今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西南）奢崇明借朝廷征兵援辽之机，派女婿樊龙入据重庆，又联合水西土司（治今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安邦彦，陷遵义，破泸州，围成都，史称“奢安之乱”。奢崇明建号“大梁”，自称“大梁王”，一时蜀中震恐。明朝以四川巡抚朱燮元（1566—1638）领兵平叛，石砭女土司秦良玉（1574—1648）率“白杆兵”英勇奋战，刘时俊奉命参赞川湖云贵四省军事，率部驻扎佛图关，与叛军对垒。佛图关是重庆老城著名险隘，千古兵家必争之地，有抗倭名将刘□（1558—1619）题刻，刘时俊睹之，有感于心，赋诗一首：

后事宜从前事求，奢酋未必胜杨酋。  
朝中命甫三推寄，阆外功旋一阵收。  
锦字石间空万古，鸿名纸上重千秋。  
途来旧业堪追否？自笑将军亦姓刘。<sup>[8]</sup>

雄关漫道，狼烟四起，刘时俊运筹帷幄，志在收复，誓将叛军控制的重庆攻克，还百姓太平，对此他充满必胜的信心：

军驻严关扼上头，凭栏百里望皆周。  
群山翠点高低列，两水清涵上下流。  
地险我何妨进退，城孤彼自受羸囚。  
一时纵目还生喜，釜底游鱼可待休。<sup>[8]</sup>

400年后读其诗，刘时俊枕戈待旦、闻鸡起舞的壮怀激烈，仍可亲可感，力透纸背；其热血报效、以身许国的万丈豪情，马革裹尸、名垂青史的英雄气概，经悠悠岁月的洗练和庄严历史的积淀，

历久弥香：

大江催日夜，烈士激中肠。  
长啸结飞飙，气欲吞八荒。  
驱车出门去，效命争战场。  
左手发乌号，右手挥步光。  
杀气凝不流，黄沙蔽日扬。  
名当辉竹帛，义为万世倡。  
笑谢蓬门者，我岂自摧藏？<sup>[8]</sup>

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生死一线，亲情尤为可贵。战争最惨烈的关键时刻，长子刘潜、次子刘泌以国事为重，携硝磺、弓矢等武器弹药，赶来重庆前线，助父击贼，令刘时俊喜出望外。刘氏一门之忠孝家风，于此可见一斑：

专征久已愧庸才，家事何尝复念哉？  
江外忽惊双桨至，膝前乍见两儿来。  
勤王早觉亲恩重，赴难还将国用裁。  
移孝作忠惟此际，一番喜动转成哀。<sup>[8]</sup>

刘时俊殚精竭虑，数挫贼锋，斩获樊龙，消灭叛军，胜利收复重庆，竟遭到监军戴君恩（1570—1636）嫉妒，向朝廷诬告刘时俊通敌，督抚和台省言官亦交章弹劾，刘时俊百口难辩。幸得御史周宗建（1582—1627）、湖广参政尹伸（1578—1644）仗义执言，代为洗雪，真相方才大白于天下，以军功加兵部右侍郎。[同治]《荣昌县志》收录刘时俊《渝城功过纪略》（又名《存奇录》《奢酋据重庆始末》）、尹伸《代太仆刘时俊讼冤疏》等重要文献，读之义愤填膺，甚至忿忿不平！刘时俊一心为国，公而忘私，竟遭小人冤枉，饱受无辜谏讯，“是

非倒置，功罪混淆”，令人扼腕长叹；“世道之升降，人心之存亡”<sup>[8]</sup>，管中可窥全豹。有道是正义可能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崇祯二年（1629）追录复渝军功，最终还刘时俊清白，赠兵部尚书，致仕家居卒。

关于本书的文献价值，有学者概括道：“全书仍以艺文门收藏为多，约六万余字，除旧志原载者外，编入嘉庆至同治初有关诗文，如教谕寇宗（曾总纂重庆府志）、谢金元，邑进士敖册贤，贡生敖京友等人的诗文，其中多有述及咸丰、同治年间李、蓝起义之战事者。而戎事门则主要记载咸丰九年至同治元年（1859—1862）李永和、蓝大顺率农民起义军由滇东北入川，进攻邑境，本邑防御抵抗战况，万余字，记述甚为详尽，有较高史料价值。人物门之忠节类亦多此一战史之记载。其余城池、关隘、津梁等门类中所载咸丰未修建之史料亦不乏史料价值。”<sup>[9]</sup>言简意赅，切中肯綮，兹不赘述。

### 三、文风严谨

文康序云，读《荣昌县志》，“阅者思已往，励将来，感圣朝休养之恩，应盛世昌隆之运。行见人文蔚起，贤哲踵兴，俾后之采风者流连不忍去，则不佞与昌荣施矣，岂特信今传后，不至如陈承祚失之诬、常道将失之琐已哉”<sup>[8]</sup>，点明了本书的严谨文风。

记载蜀中史事的乙部文献，前有西晋陈寿《三国志》，后有东晋常璩《华

阳国志》，纵横古今，八面贯通。但二书各有缺失，历史上传闻陈寿有“索米轻亮”“还相诬攻”等劣迹，因而《三国志》有不少曲笔，非良史才。明代就有人非议：“及晋陈承祚、常道将，始各撰一家言，说者谓陈失之诬，常失之琐。”<sup>[18]</sup>有鉴于此，[同治]《荣昌县志》要言不烦，力矫其琐；又秉公持正，杜绝其诬，“斟酌悉归于尽善，权衡一秉以至公”，真正实现了“信今传后，旋看永寿枣梨；比事属辞，绝少浮华枝蔓”<sup>[8]</sup>的学术目标。

如荣昌名胜葛仙山，相传是著名道士葛洪从祖父葛玄（164—244）修道游仙处，有炼丹岩、洗药池、甘露茶、打子石等遗迹。《大明一统志》记载：“葛仙山，在荣昌县东一十五里。”<sup>[19]</sup>这个里程数是沿袭北宋《太平寰宇记》的陈说：“葛仙山，在[威远]县东十五里。古老传云葛仙公曾游之地，今又随地割属昌州。”<sup>[20]</sup>《大明一统志》照搬“十五里”之数，却未细究此系威远县言之，而非自荣昌观照，故有此失察。[同治]《荣昌县志》据实订正为“县东三十里”<sup>[8]</sup>，并引《元和郡县志》《舆地纪胜》、乾隆《荣昌县志》为佐证，班班可考，毋庸置疑。

长江支流沱江的二级支流濑溪河，古称濑婆溪、思济河，发源于今重庆市大足区中敖镇，纵贯荣昌全境约51.5公里，流域面积708平方公里，在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胡市镇汇入沱江。唐

代以后频频亮相于史籍，在地方农业灌溉、交通运输、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嘉庆《四川通志》记“此水至荣昌西南止，不入他水”<sup>[21]</sup>，成为一条断尾河。事实上并非如此，[同治]《荣昌县志》釐清该河源流及各段名称，历历如绘：“思济河，县西二里。源出安岳县岳阳溪，经大足县东郭长桥下，为长桥河。又六十里至荣昌县界，为路孔河。又二十八里至观音滩，又西南流二里至县西思济桥，为思济河。又三十五里至清江滩，入泸州界。又四十里至福集场，绕玉蟾山下，为思晏江，合九曲溪，入资江（即沱江）。《通志》据《图经》谓此水至荣昌西南止，不入他水，又疑即濼婆溪，并误。小舟自三溪河可通至玉蟾山下，逾山会资水，至泸州城北则入岷江（即长江）也。”<sup>[8]</sup>如此详实的道里及流向，采访者和纂修者当有实地踏勘、精心测绘为基础，敬业精神可嘉；明确指出该河穿山越岭流入泸州境内，合九曲溪注入资水，在泸州城北汇入万里长江，滚滚东去，绝非断尾河，其科学精神亦值得钦佩。

南宋昌元烈士赵昂发，字汉卿，咸淳十年（1274）受命于危难之际，在蒙古大军南下、宋朝风雨飘摇的形势下，权池州（治今安徽省池州市）通判。德祐元年（1275）二月，夫妇同赴国难，从容就义，朝廷赠华文阁待制，谥“文节”。关于其名讳，《宋史·忠义传》作“赵卯发”，他书或作“赵昂发”。[同治]

《荣昌县志》旁征博引，从字形、音义、训诂等层面一一辩驳，确认应以“昂发”为正：“按《齐山志》：文节公讳昂发。《通志》作‘卯发’，或又作‘昂发’。查《说文》并无‘昂’字，盖昂字之讹也。昂音留，后人误作‘昂’。《史记》：‘留，言阳气之羁留也。’本西方宿。杨慎曰：‘作“昂”则阳气羁，“卯”殆不成文。’经典中凡昂毕之‘昂’，今皆误作‘昂’，音卯，而以‘留’为叶音，大谬。昂，《说文》：‘举也。’《类篇》曰：‘升也，明也。’文节之讳，当取此义。卯发、昂发作何解释？”<sup>[8]</sup>此一节考辨，举证丰富，甄述精准，逻辑缜密，结论水到渠成，后人读之，掩卷长叹，感受赵文节之忠义气节昂然勃发，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对于扑朔迷离的疑人疑事，本书持审慎态度，绝不苟且，试举一例证之。北宋时昌州老鸦山下鸭子池畔（在今荣昌区安富镇）有一位围棋国手李戡，以精湛棋艺挫败契丹挑衅，维护了宋朝的国威，宰相文彦博（1006—1097）赠以七绝诗一首：“昌元建邑几经春，百里封疆秀气匀。鸭子池边登第客，老鸦山下著棋人。”<sup>[22]</sup>南宋地理总志《方輿胜览》记载：“谯南熏，昌元人，居鸭子池，登皇祐五年进士第，后以秘书丞知阆州。李戡，时昌元县南二十里老鸦山，有李戡、李戡兄弟，善棋。会虜索棋战于国朝，诏求天下善奕者，蜀帅以戡应诏。虜望风知畏，不敢措手。文潞公赠以诗云：



‘昌元建邑几经春，百里封疆秀气新。鸭子池边登第客，老鸦山下着棋人。’”<sup>[23]</sup>与文彦博原诗有2字异文，“匀”字作“新”，“著”字作“着”。这段资料被广泛引用，其实并非原创，而是抄录此前问世的《舆地纪胜》：“昌元建邑几经春，百里封疆秀气新。鸭子池边登第客，老鸦山下着棋人——文潞公《赠谯秘丞》诗。谯南熏，昌元人，居鸭子池。登皇祐五年进士第，后以秘书丞知阆州。同时县南三十里老鸦山，有李戡、李戣兄弟善棋。会敌索棋战于国朝，诏求天下善奕棋者。蜀帅以戡、戣应诏，敌望风知畏，不敢措手，故文潞公赠诗云云。”<sup>[24]</sup>

由于李戡居住地与谯南熏同在老鸦山鸭子池，生平资料又与谯南熏捆绑在一起，故需首先考定谯的科名。谯中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癸巳科进士，与郑獬（1022—1072）同榜，已属不争之事实。郑樵《通志》列举“宋朝登科，谯南熏”<sup>[1]</sup>，但未透露具体时间。嘉庆《四川通志》“皇祐五年癸巳科郑獬榜”下，赫然有“谯南熏，荣昌人”<sup>[21]</sup>六字。《方輿胜览》之“时”字比较含混，《舆地纪胜》则明确说“同时”，可知李戡兄弟与谯南熏是同时代人，生活于北宋仁宗朝。[万历]《重庆府志》罗列“文献无征，诸史及百家不载”“故无得而订焉”的科场中人，荣昌县有“谯南熏，皇祐中。李戡、李戣、王前，元祐马涓榜”<sup>[25]</sup>。“皇祐”与“元祐”，一字之差，却将谯李

及第时间拉开了距离。按马涓为元祐六年（1091）辛未科状元，《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091年4月14日），宋哲宗“御集英殿，赐进士诸科马涓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假承务郎、文学总六百有二人。涓，阆中人也。”<sup>[26]</sup>然则二人已相去38年，谯南熏当是李戡前辈。更有资料说李戡是南宋后期人，明代《寰宇通志》谓“李戡，荣昌人，宋宝祐元年（1253）姚勉榜进士”<sup>[27]</sup>，则相去200年整，其时辽朝已灭亡百余年，何以棋战？文太师又何以赠诗？殊不可信。

需特别提出讨论的是，《方輿胜览》这条文献被编入《围棋文化史料大全》，并作如下注释：“李戡，字定臣，昌元人，皇祐五年（1053）举进士，就礼部试，吏唱名乃入，戡耻之，返江东隐阳羨里。太和中，平卢帅王彦威表为巡官。后还洛阳卒。”<sup>[28]</sup>该注释将唐代李戡与北宋李戡混为一谈，“太和中”三字已显露龃龉，更有许多基本常识错误，剖析如下。其一，“字定臣”的这位李戡，乃唐朝皇室宗亲，唐高祖李渊侄子渤海敬王李奉慈七世孙。杜牧叙其家世云：“君讳戡，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衡州盈川令。父登，婺州浦阳尉。”<sup>[29]</sup>李登晚年无嗣，夫人沈氏梦孔子亲自送子，及期生此儿，乳名天授，大名李飞。幼孤无依，家贫好学，通晓“六经”，对郑玄、孔颖达等经学大师的注疏，能一一陈其得失，颇有天赋。其二，所谓“戡

耻之”的事件，乃是李戡初次参加进士考试时，“始就礼部试赋，吏大呼其姓名，熟视符验，然后入”，李飞觉得这是对他的轻慢，“如是选贤耶？即求贡，如是自以为贤耶？”于是袖手不出，次日径返江东。《新唐书》据此以史家笔法写道：“就礼部试，吏唱名乃入，戡耻之。明日，径返江东，隐阳羨里。”<sup>[30]</sup>《围棋文化史料大全》照录这段史料，殊不知此唐代李戡与彼北宋李戡风马牛不相及。叙述逻辑上亦可瞧出端倪，“返江东”云云，为什么不是“归蜀中”之类措辞？“昌元人”李戡为什么要“返江东”？杜牧明确记载他于唐文宗太和元年（827）进士及第后，在尚书右丞沈传师幕府中亲闻群进士“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进士李飞自江西来”，可知此事发生于15年前，即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对李戡的心灵伤害很大，“卑进士不举尝名‘飞’者”，遂改名李戡。杜牧透露这一年李戡“年三十”，则李戡生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甚明。从文意看，李戡因负气袖手，并未中进士，才有隐居江东阳羨（今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之事。但《围棋文化史料大全》却说他“皇祐五年（1053）举进士”，错在编入《方輿胜览》资料时，将前一条“淮南熏，昌元人，居鸭子池，登皇祐五年进士第”的“皇祐五年”硬植为李戡登第时间，属张冠李戴。其三，王彦威荐李戡任巡官事，杜牧也有确切的时间线索：“开

成元年春二月，平卢军节度使王公彦威闻君名，挈卑辞于简，副以币马，请为节度巡官。”开成元年是836年，《围棋文化史料大全》却误为“太和中”（827—835）。1053年中进士的李戡，却在200多年前的“太和中”就被王彦威征聘为巡官，岂不滑稽？而且这巡官也是做得不久的，杜牧披露李戡生平又一重要信息：“明年春，平卢府改，君西归，病于路，卒于洛阳友人王广思恭里第，享年若干。”据此，唐代李戡的生卒年可以确定为784—837年，虚龄54岁，与宋代李戡绝非同一人。其四，棋战的挑衅方，各书笼统作“虏”“敌”，至明末曹学佺始明确指为契丹辽朝：“[荣昌]县南二十里老鸦山，有李戡、李戡兄弟故宅。二李善棋，会辽索棋战，诏求天下善奕者，蜀帅以戡应诏。辽望风知畏，不敢措手。文潞公赠以诗云。”<sup>[31]</sup>

李戡棋战本事简略，深挖则错综复杂，更有“张飞杀岳飞”之笔墨，令人啼笑皆非。相形之下，[同治]《荣昌县志》记其进士科第，却是非常冷峻的词句：“李戡，年分无考，据文彦博诗‘鸭子池边登第客’句增之。今俗犹相传鸭子池坝为谯、李两进士故里。”<sup>[8]</sup>宁缺毋滥，谨言慎行，既不夸耀乡邦、徒事玄虚，也不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缜密的治学风范。“信今传后”云云，信不诬也。

## 参考文献:

- [1] 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
- [2] 余嘉锡:《古书通例》,商务印书馆,2017年。
- [3] 李金华、乔治忠:《幕府史学活动与清初学术文化发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2年上卷(总第2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 [4] 宋可发、吴之谟:〔顺治〕《彰德府续志》,国家图书馆分馆编《清代孤本方志选》,线装书局,2001年。
- [5] 贾汉复、沈荃:〔顺治〕《河南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河南》第1册,凤凰出版社,2011年。
- [6] 刘于义、沈青崖:〔雍正〕《陕西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陕西》第1册,凤凰出版社,2011年。
- [7] 纪昀、陆锡熊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
- [8] 文康、廖朝翼:〔同治〕《荣昌县志》,《重庆历代方志集成》第5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
- [9] 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
- [10] 龚延明主编:《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中册,宁波出版社,2016年。
- [11] 中华喻氏族史研究会编:《中华喻氏通谱》,巴蜀书社,2012年。
- [12] 杨慎:《升庵遗集》,《杨升庵丛书》第3册,天地出版社,2002年。
- [13] 《喻氏族谱》,光绪十四年(1888)重刊本。
- [14] 张居正:《明世宗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
- [15]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2011年。
- [16] 龚延明主编:《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上册,宁波出版社,2016年。
- [17] 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18] 郭棐、游朴:〔万历〕《四川总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9册,齐鲁书社,1996年。
- [19] 李贤:《大明一统志》,巴蜀书社,2018年。
- [20] 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
- [21] 常明、杨芳灿:〔嘉庆〕《四川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四川》,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册、第6册。
- [22]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 [23] 祝穆:《方輿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
- [24] 王象之:《輿地纪胜》,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 [25] 张文耀、邹廷彦:〔万历〕《重庆府志》,《重庆历代方志集成》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
- [2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 [27] 陈循:《寰宇通志》,《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4册,正中书局,1985年。
- [28] 陈旸:《围棋文化史料大全》,书海出版社,2015年。
- [29] 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
- [30] 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2011年。
- [31] 曹学佺:《蜀中广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北京出版社,2012年。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熊蜀黔

## 老物件在方志馆的展示功能

杨立宇

当前，方志馆建设异军突起，方兴未艾，已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阵地和重要的展览展示窗口。方志馆是一本打开的志书，通过文字、图板、场景复原等手段进行展示，实现存史、资政、育人功能。笔者认为，其中老物件功能特殊，不可或缺。方志馆在建设布展过程中，要重视发挥老物件的展示功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展览效果。

### 一、老物件是方志馆展览展示的重要载体

方志馆的展陈手段包括传统的文字、图表、图片，也包括场景复原及视频投影、幻影成像等声光电技术，而实物展示所起的作用无可替代，正如俗语所说“百闻不如一见”。实物展示是展览的灵魂，而老物件是方志馆进行展示的重要载体。老物件通常指具有一定年代感的物品，包括地区或家族传承下来的物品、某个特定时代留下来的物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方志馆通过收藏、展示老物件，可以保留历史片段，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感知过去的生活方式、

社会面貌和文化变迁。通过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和体验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一是传承历史记忆。老物件是历史的见证，承载着过去的一段记忆或某个家庭的故事。与文物、高价瓷器、字画等藏品不同，老物件可能不起眼，价格也不昂贵，但其价值更多体现在文化和历史层面。收藏和展示老物件，可以见微知著，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和理解发生在身边的过去的故事，对历史了解得更生动、更深刻，对家乡更加热爱，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二是彰显地域文化。老物件具有强烈的时空烙印和地域特征，不同地域的老物件反映了当地的特色、习俗和传统。收藏和展示这些老物件，可以深入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氛围、宗教信仰、习俗礼仪，从中体味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比如，羊皮筏子作为一种古老的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流行于黄河中上游地区，是黄河中上游古代先民借助河水之力，运输人员、物资而发明的水上运输工具。

所以，羊皮筏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是黄河文化的鲜活元素，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再比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地方粮票、布票、肉票等票据，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市场商品供应严重不足，为保证群众基本生活的需要，国家决定发放各种商品票证来分配商品。各种票据生动反映出计划经济时代的物资供应状况和人民的生活情况。等等。

三是延续民俗传统。民俗文化又称传统文化，是民间民众民俗生活文化的统称，由一个民族、地区中集中居住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民俗老物件是民俗传统的重要元素，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承载着一个时代丰富的民间习俗、节庆活动、价值观念和信仰仪式。收藏和展示这些老物件，可以让人们了解传承民俗文化的精髓和精神，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得以延续和发展。比如油灯，最远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盛动物油脂的陶碗加上植物纤维的灯芯就是中国灯具的雏形。春秋战国时期有

了青铜灯，造型精美、功能合理，成为特定时代的礼器。到汉代，除了青铜灯，还有造型繁复华丽的铁器和陶器灯具，展示了当时的工艺水平。到宋代，油灯普及程度更高，燃料从动物油脂转为植物油脂，排烟少且没有难闻的异味，陶瓷灯具成为主流。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油灯还是中国农村夜晚的主要照明工具。油灯照亮了黑夜，让人们在黑夜读书或继续劳作，象征着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民俗老物件的精美制作工艺和充满吉祥寓意的装饰纹样往往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收藏和展示这些老物件，让现代人了解古人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

四是文化交流互鉴。收藏与展示民俗老物件，可以促进不同区域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动文化多元发展和共同繁荣。比如，虽同为黄河流域，但中上游与中下游地理自然迥异，历史文化差异很大，黄河不同地段的河湟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河洛文化、燕赵文化、



糕点模具，中间有“久久发财”字样



“鸳鸯牌”收唱机

齐鲁文化等形成了庞大的黄河文化体系。在上中下游地区举办老物件展览可以很好地进行文化交流。再比如，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彼此推出老物件展览，中华民族两大母亲河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意义与价值就十分突出。

老物件多藏于乡下与民间。当前，随着城镇化步伐持续加快，广大农村正经历着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农村人口加速向城镇聚集，大量农村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很多村庄经过社区化改造，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庄。伴随村庄变迁的是乡土文化的深刻变迁。村庄大量拆迁，客观上造成传统文化的消失。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而老物件是记录这些历史和文化的载体与符号，整理保存老物件就是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在乡村急剧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搞好老物件的收藏、整理与挖掘，充分发挥民俗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独特作用，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方志馆作为地域文化展示平台，更是重任在肩，责无旁贷。

## 二、收藏和展示老物件是方志馆的重要使命

老物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用途广泛，可以进行多种分类，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工具，比如木桶、马车、纺车、织机、套具、鱼网、渔船等；生活用品，比如模具、风箱、油灯、炕桌、油罐、收音机、黑白电视机等；证件票据，比如布票、粮票、肉票、选民证、计工本、

老地契等；书刊资料，比如《康熙字典》、毛泽东思想学习书籍、《人民画报》、早年的《大众日报》、小人书等；工艺产品，比如草编、柳编、陶器、瓷器等；名人物品，比如东营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李晔的遗物等。在传统乡村加快消失的背景下，收藏老物件应成为史志部门和方志馆的重要工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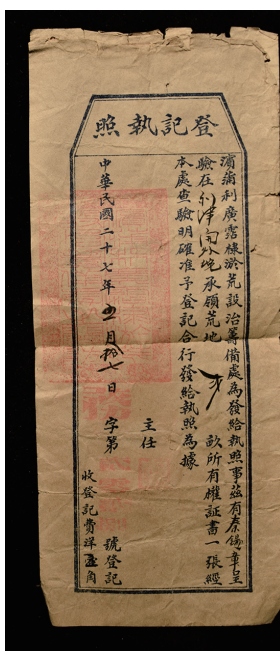
一是广泛征集。面向社会征集老物件，应该成为方志馆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常态化工作，而且必须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现在，社会上许多收藏家收藏了大量老物件，有的急于出手变现，有的希望能够展出实现其文化价值。方志馆工作者要深入基层调查摸底，搞清区域内有哪些特色老物件，有多少收藏家，收藏家都有什么想法等，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征集。国家方志馆黄河分馆建设之前，即开始关注散落民间的老物件，发动全市史志干部职工采取多种形式，历时两年共征集老物件六大类 700 余件。有见证新中国民主进程的第一代选民证，有见证一战华工（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欧洲战场派出的 14 万劳工）的纪念章，有见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清河区、渤海区战斗历程的珍贵书籍，有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和合作社历史的地契、账本，有见证胜利油田开发建设历程的珍贵物品，有见证时代发展的宣传画、木版画、电影海报，有见证黄河口先民生产生活实况的老票据及各类生产生活用

品及见证黄河口人民生活百态的民俗用品，有见证东营地区先进模范人物事迹的个人物品，等等。对征集的这些老物件进行分类登记和文字发掘整理，2016年编纂出版《时光有痕——黄河口老物件》一书，并在2018年黄河分馆进行展出，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二是接受捐赠。对于社会上有意图捐赠老物件者，方志馆应通过一定程序予以接纳，给捐赠者出具收藏证书，登记编号保存。对于历史文化价值突出的老物件，可举办一定形式的捐赠仪式，加强宣传，扩大影响。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方志馆建设初期，对于社会个体捐赠老物件者，不宜设过高门槛，小到一个顶针、大到一辆马车，只要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合乎展览需求，原则上都应在接受之列。对于已有馆藏的老物件，也不宜拒绝捐赠行为，同样的老物件多贮备备份有益处，尤其利于办展交流。2020年，黄河分馆一次性接受社会捐赠文物6件、奥运火炬1件、老族谱若干，丰富了馆藏和展带，深

受观众欢迎。

三是多方购买。方志馆应列出采购计划，制定采购目录，拿出专门经费出资购买部分老物件，以充实馆藏，丰富展带。据统计，每年全国消失村庄几千个，而很多老物件伴随村庄一起消失。很多农村老房子拆迁后，一些带有强烈时代印记和地域特色的老物件被随意丢弃。水缸、水桶、扁担，线板、纺车、织布机、针线筐，小推车、地排车、大板车，耩车、钉耙、绳套，簸箕、面箩、油罐，八仙桌、八仙椅、小板凳，等等，这些司空见惯的老物件虽非文物，但它们记录了一个时代，是广大农村在那个时代日常生产生活的见证，更是农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美好生活的印记，包涵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登记开垦荒地执照



1954年选民证

着吃苦耐劳、坚韧向上、不屈不挠等可贵精神，是缅怀历史、寄托乡思、留住乡愁的有效载体。现在，一些市场眼光敏锐的商家开始收购此类老物件。方志馆作为公共文化平台，可以派出专人下乡收购，也可联合基层组织引导群众有计划做好留存工作，有计划、有选择地购买。抓住城市进程加快这个时机购买老物件，可以达到花小钱办大事的目的。

四是借展联展。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方志馆要积极向民间收藏家借展或联合民间收藏家共同办展。民间收藏家多为当地文化人士，收藏老物件大多是出于热爱和人文情怀。他们希望通过一定形式的展览将收藏的老物件展示出来，让社会大众共同鉴赏分享，更好地发挥老物件的社会教化功能。收藏家有老物件，但缺少场所，不善策划与展览。方志馆可以发挥自身优势，联合收藏家一块办展，实现一举两得的目的。与村史馆和民俗馆合作办展也应成为方志馆的努力方向。现在，村史博物馆或民俗展览馆发展很快，虽然规模不大，但馆藏老物件很具代表性，可以成为方志馆合作的对象。一方面，方志馆要充分发挥专业人才优势，加强对村史博物馆和民俗展览馆的指导，同时与他们加强合作，实现老物件共享，可以牵头策划举办规模更大、主题更鲜明的特别展览。

### 三、深入挖掘整理和讲好老物件背后的故事

绝大多数老物件虽非文物，但也是

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挖掘整理和讲好老物件背后的故事，可以管中窥豹，折射一个时代，再现一段历史；可以激励人们记住乡愁，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一是讲好黄河故事。黄河性是国家方志馆黄河分馆的重要属性，收藏和展出老物件应突出黄河文化特征，同时讲好老物件背后的黄河故事。要面对黄河全流域进行收集，尽可能做到上中下游各个流段、各个省区典型老物件齐备。物件齐备，故事才丰富。历史上的黄河善徙、善淤、善决，灾害频发，治河一直是历朝历代的大事，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黄河岁岁安澜。要广泛收集石碾、石夯、电石灯、灾情报警铜锣等治河工具，讲好治河故事，充分展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斗争精神，展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实现黄河转危为安的根本保证。黄河文化的本质是农业文化。黄河上中下游，不同流段的农业生产不同，生产工具不同，人们的生活习俗也不同。要广泛收集，深挖细掘，生动讲好老物件背后的生产生活故事，以小见大，以古照今，讲出黄河文化的风采与魅力。

二是讲好移民故事。东营是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而大规模移民则始自元朝，特别是明清两朝、民国时期，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黄河口地区移民



包括农业移民、工业移民，政府移民、自发移民等，频次多、规模大，域内移民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移民文化。境内居民“三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生产生活习俗独特，带有浓厚的迁出地烙印。广泛收集、收藏、展示移民老物件，讲好老物件背后的故事，生动再现移民历史、黄河口开发历程，传承东营移民文化的包容、务实、拼搏、奋进、创新的文化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三是讲好石油故事。东营是胜利油田的发祥地和主产区，东营因油而生、因油而兴。从六十多年前华北勘探发现“第一股工业油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满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情开展孤东会战，到新世纪秉承“从创业走向创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推进勘探开发，到今天为实现能源安全而奋进，数以万计的石油人心怀“国之大事”齐聚黄河口，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创造了辉煌历史，留下了大量生产生活老物件，每一个老物件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石油文化是东营移民文化、东营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前期，黄河文化馆搜集和展出了部分来自胜利油田开发建设的老物件，一把锈迹斑斑的管钳，一个伤痕累累的钻头，一台破旧的打字

机，一个报废的阀门，无不述说着那一段峥嵘岁月。方志馆要进一步做好征集、收藏和展示工作，倾情讲好石油人战天斗地献石油的故事，继承和弘扬油地“一盘棋、一家人、一条心”的优良传统，以油地融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加快高水平现代化强市建设。

四是讲好红色故事。东营是一片红色热土，是山东省最早建立农村党支部的地区之一，清河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六大战略区之一，革命历史悠久，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红色革命文物、革命故事众多。如，首版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犹如一粒火种引燃了东营地区的革命风暴，刘集的箆子、夜校的油灯、“砸木行”的枪头、北海银行的纸币、兵工厂制造的枪炮、出版发行的《群众报》《渤海日报》……

方志馆要广泛搜集红色照片、红色文物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老物件，通过编纂红色读物、举办专题展览、开展红色研学等方式，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让东营地区红色故事承载的革命精神跨越时空，绽放新的光芒，焕发新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史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陈伟

## 云阳教育趣闻

叶仁军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云阳教育发展至今天，已经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云阳教育的发展和全国各地一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回顾历史上云阳教育的一些片段，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鉴古知今，对于云阳未来教育的发展，不可或缺。

从2300年的云阳历史长河里去梳理云阳教育往事，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笔者在云阳县志和史料中略做梳理，就颇有收获，现将云阳县民国及以前的教育趣闻趣事叙述如后。

### 云阳教育之始考证

云阳县学，宋代以前失考。元至大初年（1308），在治城东北（今东风小学）重建学宫。后来又在治城东北、云安盐场北岸各建社学1所，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为师。至明代，于学宫内建明伦堂、御书楼、棖星门、至圣先师殿等，并营造学舍。清代中叶，社学先后被私塾、书院代替。自乾隆至光绪，全县先后设立云安书院、陆吴书院、云峰书院、凤鸣书院、五溪书院、象山书院、曜灵书院七大书院，一时成为云阳教育

的标志。书院生员都以应科举登仕途为目的，据不完全统计，从唐文宗太和五年（831）李远第一个进士及第，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贞安最后一个中进士，云阳县有进士26人。元、明、清三朝，云阳有文（武）举人77人；明、清两朝有贡生419人。

清及以前朝代，云阳城乡办学形式多为私立学塾。到嘉庆（1796—1820）后，私塾不断增多，每个乡场均设一间或多间私塾。有家馆、族馆、团馆、集馆、义塾等五种办学形式。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全县仍有私塾18所。1951年下半年，随着全县农村初级小学的发展，私塾全部停办。

### 云阳历史上第一位进士

云阳县历史上第一位进士李远，字求古，一作承古，云安县（今云阳县）人。生卒年不详，唐宪宗至懿宗朝（806—860）在世。唐文宗太和五年进士及第，“廷对第一”。历任重庆忠县、福建建瓯、江西九江等州刺史，皆有政声。唐宣宗（846—859年在位）即位，宰相令狐绹荐李远为杭州刺史。宣宗道：“他

有‘青山不厌三杯酒，长日惟消一局棋’之语，疏放如此，焉能担此大任？”令狐绹曰：“诗人遣兴之作，不可当真。”李远在杭州果有政声，遂入为御史中丞。李远为人耿介，崇尚节俭，遇有贵客，惟送两只鸭子而已。他的诗文俊逸清丽，尤以赋名重一时，有“许浑诗，李远赋，不如不做”的民谣。其诗文收入《全唐文》《全唐诗》中。

历史上关于李远的记载，如果仔细辨别，会有一些发现。唐代文献《全唐诗》是最早记录李远的书籍，收录了李远的诗歌作品并简要介绍他的生平。称李远是唐文宗太和五年（831）进士，曾任地方官职，以诗文闻名。宋代文献《唐诗纪事》提到李远的诗作和进士身份。元代辛文房撰写的《唐才子传》，提到李远是蜀地人，中进士，以文学才华著称，诗风清新自然。明嘉靖《云阳县志·人物》记载：“李远。字求古。省元咸通（873）进士。有诗集行于世”。《四川通志》称李远云阳人，唐太和状元。

综合史料，关于李远的记载有两点值得辨析：一是李远考进士的时间，二是李远是否为状元。多数史料记载，李远在唐文宗太和五年进士及第，而明嘉靖《云阳县志·人物》记载为“省元咸通进士”，“省元”在古代科举考试中指的是省试（会试）的第一名。省试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考中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省元”或“会元”。唐懿宗“咸通”年号为公元860年至874年。而李远的生平记载为“生卒年不详，唐

宪宗至懿宗朝（806—860年）在世。”说明如果李远是咸通进士，那他至少54岁或者年龄更大才考上进士，这和其他史料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明显不相吻合，所以，明嘉靖《云阳县志》和清乾隆《夔州府志》称李远为咸通进士，显然是错误的，应为太和进士。《四川通志》记载李远为唐太和状元，县人相传旧有“状元坊”，为远立也。云阳地方史界学者也多人认为李远为状元，并且是云阳县科举时代唯一的状元。但众多史料除《四川通志》外都没有记载李远为状元，民国《云阳县志》记载李远“廷对第一”，这并不意味着就是状元。重庆工商大学学者熊笃考证唐太和五年进士榜状元为湖北襄阳人杜陟。不管哪种方式查询或考证，李远是云阳县第一个进士不假，却不是状元。

### 祖孙三代五进士

北宋元祐六年（1091）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间，云安出现袁氏祖孙三人先后考中进士的嘉话。宋元祐六年，袁师爽考中进士，其后弟师文考中进士。二十余年后，其父袁孝纯也考中进士，袁孝纯考中进士时，可能已到耄耋之年了。十六年后，袁师爽之子，袁孝纯之孙袁道明也考中进士。引起朝野极大关注。因此，从明朝起，历代县志都予以记载。明《云阳县志·选举》记载：“袁纯孝。政和进士。袁师爽，绍兴进士。与父纯孝、兄师允、师文俱明经登第，

见《蜀志》。袁师文，元祐八年（1093）进士。徐州观察使。袁师允。绍兴进士。袁道明。建炎进士。俱师奭子。任光泽令，升招信军知军。”

这一历史趣闻应该有三处存疑，值得辨析。一是科举年代是否有误。云阳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云阳史略》对其中史实的准确性表示怀疑，就加编者按，“按：袁孝纯父子、祖孙、兄弟三世俱登甲科。据旧《志》称，孝纯系徽宗政和二年（1112）壬辰科莫俦榜。师奭反系哲宗元祐六年（1091）辛未科马涓榜，即谓子先父通籍。而元祐至政和，上下二十余年，亦太悬隔。恐父子名称或制科年代，必有一误，未敢遽改，姑录俾考。”表示袁孝纯父子名称或者是科举年代有误。二是袁纯孝其人名字叫“袁纯孝”还是“袁孝纯”？云阳现存的五本古志中，明嘉靖县志、清乾隆县志、清咸丰县志称“袁纯孝”，清光绪县志、民国县志则称“袁孝纯”。云阳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云阳史略》称“袁孝纯”，云阳县教委编撰的《云阳教育志》则称“袁纯孝”。谁对谁错，也有待考证。三是袁氏三代到底是一门四学士还是五进士？在《云阳史略》中称一门四学士，袁纯孝、袁师奭、袁师文、袁道明四人先后考上进士，在《云阳教育志》则袁纯孝、袁师奭、袁师允、袁师文、袁道明五人考上进士。从明《云阳县志·选举》中看，应该是袁纯孝、袁师奭、袁道明三人先后考上进士，袁师允、袁师文二人明经及第。明经及第并不等同于

中进士。明经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明经科考经学和时务策，考试难度相对较低，一般被任命为乡、县、府等地的官员，地位相对较低。而进士是科举考试中最难的一科，通常被任命为朝廷高级官员，地位较高。进士科始于隋朝，是唐朝科举制度取士的科目之一，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进士称号的人被称为进士，是功名的尽头，就算是对名次不满意亦不可以重考。因此，明经及第和进士及第是两种不同的科举考试及第情况，不能等同。

### 劝学诗

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己卯年八月，今四川省三台县人王日翬出任云安军知军。为尽快熟悉云安军情况，他到云安监考察。云安监知监程某热情接待了他。二人在闲谈中，王日翬了解到，因汉朝扶嘉有“三牛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之说，因此，云安军以盐业为龙头的社会经济发展较好，但是教育事业明显滞后，全军没有一所象样学舍，连私学都很少，因此，从汉朝至南宋的近千年间，很少出现有名文化人，这让王日翬十分着急。为扭转县人重钱轻文的现象，王日翬与程某商量决定写一篇《劝学诗》，劝导县人重视文化教育，开展文化学习，提高文化素养。现在读到王日翬的《劝学诗》来，仍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其诗曰：

云安古汤溪，□□□□滨。  
 无室不盐烟，无民不樵薪。  
 士子独希少，锥刀事艰辛。  
 我因捧檄来，暇日聊咨询。  
 溪山秀且清，湛碧高嶙峋。  
 衣冠杳不报，敢问夫何因。  
 盛言汉廷尉，有语诒乡邻。  
 三牛对马岭，有井无贵人。  
 斯言既笃信，诗礼不复闻。  
 我闻为咨嗟，此语深非人。  
 儒风一旦扫，有甚遭烧焚。  
 因言廷尉者，其生岂不神。  
 既禀神灵姿，宁非圣贤伦。  
 安得鄙俚语，千载愚斯民。  
 斯民有辛氏，贵岂无足尊。  
 唐皇上柱国，伪蜀掌丝纶。  
 遗诰尚可考，苗裔亦泔泔。  
 后生宜可畏，况逢尧舜辰。  
 如何三百年，自弃甘煨尘。  
 前贤不知慕，俚语常书绅。  
 不知非格言，野老相因循。  
 为言听我语，蜀民初顽嚚。  
 文翁有益州，化蜀与维新。  
 英才出王马，继世扬子云。  
 词章蔼当世，至今耀清芬。  
 自尔吾蜀土，文学多彬彬。  
 乃知汤溪上，未必无国珍。  
 琢磨始成器，匪即为荆榛。  
 我虽非文翁，志使风俗淳。  
 亦非好辩者，示劝聊谆谆。  
 公侯宁有种，自致唯斯文。  
 蜀学乃孤陋，师友须隆亲。  
 又当听我言，既学须能勤。

不勤如不学，勤学始成身。  
 穷兮世巨儒，达兮国名臣。  
 唯恐学不至，学必无沈沦。  
 不如复前熏。十室有忠信，  
 见者希能遵。会观集岁后，  
 俊选来闾闾。一成诗礼乡，  
 举充观国宾。

### 兴办第一所中学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朝廷推行戊戌变法，实行改革新政，其中一项就是结束数千年的旧学体制，实行新校制。为此，朝廷派出5名大臣，赴西欧各国进行学制考察。回国后向光绪皇帝汇报，后经朝廷议决，决定在全国推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全国推行新校制诏书颁发。诏书要求每一个县要设置中学或高等小学1所，各乡要设置初级小学1所。民国《云阳县志·学校》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兴学之诏书始下。知县刘孝祚，从县人议，募资独建中学一所，择城西五里先农坛旧址为校址，甘作仪、石古存监修。三十一年乙巳讫功。计费二万余缗。基构坚朴，房舍整贍，左为操场，及藏书楼等，规制闳伟，冠于列县。增置仪器，书籍甚备。初立高等小学。三十二年丙午，县人涂凤书主校事，呈请改设中学。遂开办中学两个班，附高等小学两个班。民国十三年（1924），添设高等小学一个班，迄今毕业已届十二班，都一百数十人。英髦云兴，成效甚绪。”并附甘作仪《云

阳中学校兴造记》一文：“国家自庚子变法，废科学兴学校，毅然有以通数千年之变，必使党庠州序小成、大成由乡而国而天下，咸奉车书，以宏大一统之规，特诏重臣五人，分赴各国，甄采学制，斟酌损益，俾象鞮重，译通中外之邮，以跻同文之盛。使者复命，廷议京师，暨各行省、郡、县地方，分建校舍，在城曰中学曰高小，在乡曰初级，并颁发教育诸书，毋使躐等，制诚善矣。夫《礼》《乐》《诗》《书》，断自唐虞三代；声光电化，阐由周秦百家。道菑具备，体用兼赅，自后世逐末忘本，汲汲于文词声偶之末，流极而蹶。遂令纵横捭阖者，流挟其一得以自鸣。七国之墨本，六朝之黄老，其前征也。苟非贤君相立四教、崇四术，出屯启蒙，胥国民而陶铸之，安见德菑同归于俊，造流弊不甚于青衿几乎？然则学校之兴，始于格致，终于治平，顾可视为缓图哉！岁壬寅，县宰刘公孝祚，承制兴学，就先农坛旧基拓而大之，复提书院、学田、宾兴、卷价一切租谷之合，于公局者藉者资挹注，随檄公局人士轮充监修。经费不足，则醵金勸助，兼募于邑之富者，共耗二万余金。阅历三载，功以告成。而刘公迁去，周公吉云继之，延师课士，务以明庶物察人伦，为预备大学之选。作仪与于修之役，因记其颠末，俾后之学者知其所由。始同是役者，岁贡刘光济、赖恢绪；职员张元龙、邬先炬、王福修、石继美、王遵善、薛道安、石古存、张中吉、魏树春；生员石敬武、彭联登。例得备书。”

在一众当地名人的努力下，经过3年的建设，“云阳县初等小学”学校建成。次年，学校改名为“云阳县立中高合校”。至此，云阳县始有中学校。

### 推进“国民教育”制度

民国二十九年（1940）八月，县政府在全县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全县原两级小学一律改为“中心国民小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乡镇中心小学），将短期小学、民众学校等临时性或民办学校一律取消，与初级小学合并改称“保国民学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村级小学）。民国三十一年（1942）二月确定高阳、南溪、凤鸣3所中心国民学校为县指导的“示范中心学校”（即重点学校），逐步在全县形成保校、中心国民学校、示范小学为体制的初等教育格局。由于捐税奇重，物价暴涨，民不聊生，一般百姓送子女入学者甚少。民国三十三年（1944），县政府颁布《强迫入学条例》，限令家长送子女入学，凡7日内未送子女入学者，则张榜公布；仍不入学者，则课以罚款。在这样的高压势态下，方才有部分家长将子女送入学校，但中途又找各种借口退学，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仍不高。民国三十八年（1949）下期，全县共有中心国民学校48所、保国民学校468所、私立学校7所，入学学生5274人，失学儿童比例80%以上，468所保国民学校也因经费筹措艰难而停办。

###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和民众教育

职业教育的起步始于民国二十年（1931）。县立初级中学增设职业教育班，开设蚕桑、林业等专业，以养济院桑园“中山林场”为实习场所，不久停办。民国二十一年，县立西城小学附设简易职业班，开设毛织、印刷等科，两年后学生毕业停办。民国二十二年，云安镇成立陶氏族立职工学社，招收族中失学男女，教授织染、棕木诸科，次年改为陶氏小学。民国二十六年，云阳商会各同业公会每年捐银，在西坪原蚕桑学校旧址创办“云阳县私立初级职业中学”，开设农、商专业。民国二十八年，该职业中学商科停办，学校更名“云阳县初级农业职业中学”，迁往下溪沱（原宝塔乡人民政府驻地）。同一年，由桐油、盐业、药材公会决定每年捐资，在县城西坪首创蚕业学校。截止民国三十七年，云阳县初级农业职业中学办商科1届，农科17届，毕业学生331人。

师范教育的发展始于民国初期。云阳等六县在夔州府设立夔州府师范学校，云阳有近60名学生先后在该校就读。民国十八年（1929），在官立女子两等小学堂内设立云阳县女子师范传习所，招收女生就读。是年秋，更名“云阳县女

子师范学校”。同年，在县立中学附设师范班，招收男生，次年学生结业后停办。民国二十三年（1934），女子师范学校易名“云阳县女子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民国三十六年，学校开始男、女混合招生。截止民国三十八年，共培养19届毕业学生394名。这些毕业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不可或缺精英。

民众教育初创于民国初年。劝学所内设有讲演员，下乡巡回，启迪民智。民国二十年，全县兴办2所民众学校，分设儿童、妇女、成人班。民国二十四年，在女师校开办妇女补习学校。民国二十五年，“云阳县民众教育馆”（简称“民教馆”）成立，负责全县民众教育。民教馆发布强迫入学办法，强行“征学”。民国二十六年，全县办有民众学校33所，在校民众2830人。次年，民教馆开设成年失学民众补习班，扫除文盲2027人。民国三十四年，全县开设民教班419个，入学民众2117人。民众教育以普及识字为主要内容，间以生活常识和道德伦理教育。民国三十八年（1949），民众教育馆奉令裁撤。

（作者单位：云阳县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陈伟

## 寻幽探奇说寨子

李正权

巴蜀各地，寨子随处可见，或大或小，大多建在山顶。多的地方，一个乡也有四五个。重庆北碚区的蔡家岗镇只有45.75平方公里，就有古寨11座，平均每四五平方公里就有1座，密度之大，堪称一绝。民国《巴县志》所列“阨寨表”，全县有152处，除佛图关、二郎关、青木关等少数几个“关”（正式的或官方的军事设施）外，竟有寨子140多个。清道光《江北厅志》所列寨子，则有82个。道光年（1821—1850）后，四川重庆兵乱匪患更重，新建寨子层出不穷，加上原有的，少说也有100个以上。如今重庆主城区基本上是原巴县、江北县所含地界，还包括原合川、璧山的部分地界。也就是说，仅重庆主城区这片土地上就有240多个寨子，每隔八九公里就可以看到，真可谓星罗棋布了。

### 一、寨为军事建筑

**城寨的起源** 寨本写作“砦”，也写作“柴”，本指四周的栅栏或围墙，后来引申为四周有栅栏或围墙的地方。栅也称为栅栏，《说文》：“栅，编竖木也。”也就是把若干木料竖起来，按顺序排列，编织在一起，形成栅栏。栅栏就是用“栅”来做成的“栏”。事实上，栅读作zhà时，

与寨的读音相近，二者渊源相同。最早用栅栏围起来的寨子，因木料易于腐烂，遗址不能保存，我们也就不知道其起源于何时。用围墙围起来的寨子，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四川三星堆遗址就已经有了。不过，三星堆却被称城。城是典型的军事建筑。城堡、城池、城堞、城防、城关、城壕、城楼、城邦、都城、边城、城下之盟、攻城略地、万里长城、众志成城，都反映了城的军事功能。寨也是军事建筑，因而也就有诸如军寨、营寨、寨堡、边寨、寨墙、寨屋、寨壕、寨沟、安营扎寨之类反映寨的军事功能的词汇。从广义上来说，城就是寨，寨就是城，寨与城应当是同义的。

开始时，只要筑有城墙就称为城，其实那城小得现代人无法想像。三星堆可能是古代蜀国的都城，占地面积比较大，不少于4万平方米。巴人曾在广阳坝江对岸筑有滩城，只有“周一百步，阔五尺”。“周一百步”，即使以周制八尺为步（周代一尺只有23厘米多一点，比现在短得多），抛起计算，那周长不过200来米，面积也就只有2500平方米左右，比三分之一足球场稍大一点，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寨子。从建筑



格局、建筑形态及其功能来说，早期的城与后来的寨几乎没有区别。

**寨的多种含义** 从词源学考察，寨或寨子的出现就比城晚多了。大概到了南北朝时期，才有了寨的说法。那时，寨只限于军队行军过程中或临时驻扎时修建起来的防卫设施，大多还限于用木栅栏构建的防卫墙。鉴于木栅栏的防卫能力较弱，如果军队驻扎的时间较长，往往就要筑城。这样的城，大多是临时使用，可能不像正规的城那样牢固，但与城也就没了区别。由于是军队临时性驻扎的地方，就被称为寨。《陈书·熊昙朗传》：“时巴山陈定亦拥兵立寨。”这是文献上出现得最早的寨。从中或许可以推想，这样的寨带有临时性质。

后来，就把那些临时修建起来用于防卫的城称为寨，以区别于那些固定的正规的城。但是，什么是固定什么是临时，什么是正规什么是不正规，却不好区别。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城与寨往往没有认真区分过。例如重庆合川的钓鱼城，是抗击元蒙临时修建的，却叫作城而不叫作寨。而与钓鱼城同时修建起来，也是为了抗击元蒙铁骑的重庆云阳磐石城，也被称为磨盘寨，城与寨就没有了区别。即使到了晚清，一些农民自己修来防范土匪的寨子，也有称为城的，例如重庆渝北就有号称天城的寨子。

寨也指边境的防御墙和大型屯兵堡寨。宋代甚至把寨作为一级军事行政单位，不过大多设置在边远地区，由州或县管辖，相当于镇。

本来用于军事目的的寨，后来得到引申，凡是有栅栏或围墙围起来的地方，都被称为寨或寨子。寨或寨子就有了三种含义：一是指用于军事目的寨，例如军寨、营寨、寨营之类；二是指四周有栅栏或围墙的村落，例如村寨、寨落、苗寨之类；三是指强盗土匪聚居的地方，例如山寨、寨主、压寨夫人之类。

**城与寨的区别** 总体来说，城与寨子的区别，大概可以归纳为5个方面：一是从功能上来说，城是长期固定的建筑，寨子往往是临时修建的。二是从规模上来说，城的规模往往较大，寨子的规模一般都不大，不能与城相比。三是从地理位置来说，城一般建在交通要道上，寨子往往建在荒山野岭。四是从管理角度来说，城里驻有相应的行政机构，寨子里即使有相应的行政机构或官方人员，也是因为军事的原因临时驻扎。五是从日常形态来说，城里往往有较多人口，形成有市场，相当繁华；寨子里虽然有人，但不多，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寨子只是作为紧急情况下备用的设施，平时可能并不住人或只住极少的人看护，说不上使用，军事功能往往是闲置的。

发展到后来，寨子就主要指民间的一种军事建筑，既不是村寨，也不是军寨，但又包含了那些具有较为完备防卫设施的村落，也包含了那些专门修建起来作为防卫的军事建筑设施，还包括了强盗土匪占据的有较为完备防卫设施的地方。其特点一是四周建有围墙（城墙）或利用地形地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防卫设施，

二是主要由民间修建或由民间使用的，三是主要用来防范强盗土匪和战乱的，当然也有一些寨子是强盗土匪占据的。

## 二、川渝典型之寨

川渝地区地形以山地、丘陵和平原为主。一般来说，寨子都修建在山顶或崖边。作为军事建筑，寨子主要是用于防卫的。冷兵器时代，要攻下那山顶崖边的寨子，很难。正因为如此，地方守军、豪绅富商、土匪兵痞以及农民起义军均要找一合适处修建寨子，以作后方根据地。

**大足永昌寨** 建在山顶的寨子最多。重庆大足北山，古名龙岗山，距县城两公里。唐代末年，军阀混战。时任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和静南军使的韦君靖，在龙岗山上修建永昌寨，将昌州州治也搬进寨里，储粮屯兵，以固自己的地盘。那永昌寨周围二十八里，四周悬崖峭壁，易守难攻，可保无虞。后来，他又组织能工巧匠，在寨子里凿石造像，“凿出金仙，现千手千眼之威神，具八十种之相好”，首开大足石刻先河。去大足北山看石刻，依然可以看到那山沿悬崖上的寨墙遗迹，还可以想像当年那唐寨的雄风。

**犍为罗城** 四川犍为县的罗城规模虽然不大，却坐落在一个椭圆形的山丘顶上，四周都是悬崖，东西长，南北短，像一把织布的梭子，

叫作凉厅子。罗城本是“军事铺”，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主要用于屯兵制夷(西南少数民族)，镇西的营盘山就是当年的屯兵之地。清咸丰、同治年间李永和、蓝朝鼎农民起义就曾以罗城为根据地，坚持数年。1908年，同盟会四川省负责人熊克武也曾来到这里，秘密制造炸弹，欲将罗城建成推翻清王朝的根据地。从修建到使用，罗城实际上就是一个寨子。

**垫江鹤游坪** 重庆垫江县鹤游坪则建在丘陵上，“岩冠高耸。四周悬岩峭壁，路绕羊肠，盘曲而上，后人于扼塞处设有卡寨。东西山缭绕曲屈，拱护如莲瓣，坪其药也。州同署居其中，名保和寨。”(《涪州志》)从明末以降，川东发生过不少战乱，人们大量修筑寨堡，以护家园。鹤游坪寨堡有两大特点，一是面积大，周长在210华里以上，可算是世



垫江鹤游坪古寨寨门

世界上最大的山寨式城堡；二是在大城堡内，又有几十个小城堡，这种城堡中有城堡、寨子中有寨子的格局，世所罕见。因这样独特的军事防范功能，清代还曾在鹤游坪寨子里设分州府。

**丰都栗子寨** 重庆丰都县栗子寨的地势更加险要，坐落在一座向一面倾斜的高山上，最高海拔 1428 米，四周是悬崖峭壁或陡坡，山脚下有 3 条小河围绕，构成天然的护寨河。进寨只有 4 条险路，前山一条，后山一条，左右两边各一条。栗子寨是其总名，寨里修了 48 个小寨，每个寨口都有寨门关卡，整个寨子共有 48 道山门，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卡。因地势险要，历来是土匪的藏身之地，匪地之争、剿匪之战，不知经过了多少血雨腥风。据说，张献忠曾路过此地，秦良玉曾在此建设有行宫，石达开也曾在此驻过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川东“土地会”起义诞生的红军游击队，曾以栗子寨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土匪占据栗子寨，被解放军攻克。如果你有机会去游览，可能还能感到那栗子寨的草草木木都还充满着杀伐之气。

**蜀南天宝寨** 最让人叫绝的是建在悬崖半腰的寨子。四川长宁、江安两县交界处的蜀南竹海风景区中有一天宝寨，就建在悬崖中间的绝壁上，依天然洞穴地势构成。寨长 1500 米，高 20 米，宽 10 米左右，

洞顶部系岩石构成，多为半边洞，依洞而建，曲折奇特，内有独具匠心的 13 道坚固的石寨门，地形险要，可谓天险固堡。相传是清咸丰年间（1851-1861）地方官府为防御石达开太平军入川而建。民国初年，匪盗为患，地方豪绅为了防匪防盗，曾搬到此地居住。重庆江津区四面山也有这样的寨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被土匪占据。解放军前去攻打，动用了迫击炮之类重武器，费了很大的力才攻下来。

**云阳彭氏宗祠** 还有一种寨子将军事防范功能与其他功能结合起来。重庆云阳县的彭氏宗祠雄踞于群山之间陡峭的岗峦之上，坐西向东，复四合院布局，占地 3500 平方米。虽然没有城墙，但四周房屋的墙体却全部是用条石砌成，厚达 1.3 米，形同坞堡。坞堡内，有门厅、享殿、耳房、厢房、高楼及四角炮楼。高楼居两院正中，木结构九级楼阁式，



云阳彭氏宗祠

可以监视方圆几十里的情况。作为祠堂与坞堡结合的群体建筑，彭氏宗祠集祭祀、防护、住宿为一体，具有明显的军事防范功能，也可称为寨子。

### 三、寨的新旧功用

**寨子的旧功用** 几千年来，社会真正安定的时间并不多，社会动乱往往是常态。这种社会动乱，既表现为争权夺利改朝换代的全国性战争，也表现为强盗土匪引起的局部动乱。正因为这样，军事或与军事相关的建筑，往往就成了除民居、宗教建筑之外最重要的建筑类型。围沟、栅栏可能是最早的军事建筑，而城、镇、寨、堡最早也是军事建筑。

到了近代，军阀混战，兵匪横行。作为民间的军事建筑，寨子得到极大发展。豪绅富商们或独资或集资，在家门附近的山头上修起大大小小的各种寨子。如遇兵匪来侵，豪绅富商以及一般农民便会扶老携幼往寨子里躲。寨子易守难攻，若无特需，兵匪也不去攻打。只要能在寨子里坚持几日，便可躲过一场灾难。但若被包围得过久，寨子里便会不战自乱。主要是饮水问题。寨子在山顶，往往缺少水源。钓鱼城之所以能坚持那么久，就在于那“城”里有水。据传，当守军把一条活灵灵的鲜鱼举到城门上，进攻的元军见了便蔫了气，只好撤走。可见水对于寨子的重要。

笔者当知青时，曾爬到一个寨子里去看过。寨子修在山顶上，成圆形，直径约一百米。虽已破败，但基本格局还在。山顶较平缓，四周是城墙，用条石砌成，

高约一丈。城墙外是悬崖陡坎，从外面看，就更显得高峻，要攻进去也就很难。房屋已垮塌，只剩地基隐在野草丛中。由于极少人再去，那上山的路也废弃，极难走，我们几乎是手脚并用才爬上去的。

**寨子的新功用** 不少寨子占据着好山好水，自然就有了好风光，可以开发利用。位于重庆巴南区与江津区交界处的云篆大寨，占地500余亩，寨墙长4000多米，东西南北险绝的隘口处用条石卷砌成高3~5米、宽1.5米的寨门4道，悬崖险峻，苍松挺立，藤萝垂挂，野花满布。更有九堡十三湾，堡堡有林，湾湾有水。清巴县知县王尔鉴诗云：“涧影环飞瀑，江涛曲泛松。”可知其景色之迷人。云篆风清被列为清巴渝十二景之一。寨墙、寨门至今犹存，山水秀丽依旧。前文提及的大足龙岗寨、合川钓鱼城、犍为罗城、竹海天宝寨、云阳彭氏宗祠等，如今都已经成为旅游景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安定，寨子失去作用，毁弃的居多。作为历史陈迹，除了像钓鱼城、罗城那样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像天宝寨、云篆大寨那样至今仍可作旅游之处的外，寨子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作为文化现象，寨子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窥见社会历史的变迁，因此应当加以研究。谁能就此写出一部专著来，将是功德无量的事。

（作者单位：市公安局 退休）

责任编辑：陈伟

## 涪滩说“涑”

姜孝德

有人在互联网上调侃重庆的地名，开篇便“打油”说：“说聊斋，话聊斋，重庆的地名有点怪；虾子碛、癞子坝，这样的地名惹笑话；蚂蝗石、麻风河，叫我说都不好说；不好说，也要说，说来大家乐一乐。”这些地名，乍一听我也会笑，但当我们理解了其中含义后，你或许会感叹。此前，我解读过“碛”的独特含义，也因此我感叹汉字的博大精深。今天，我想解读的是“癞子坡”的“癞”，它跟“涑滩”的“涑”是一个意思，只是用字不同罢了。

涑滩，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北 30 公里的渠江西岸鹫峰山上，三面是悬崖峭壁，一面临江，是一座建造于宋代的古

寨，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今天人们更愿意称之为古镇，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首批中国最美村镇、国家 AAAA 级风景名胜区。内有瓮城、文昌宫、双龙湖、明代石碑坊、清代舍利塔林、明清墓群、石刻题记等知名景点，其中以清同治元年修建的瓮城最具特色，这是目前重庆境内唯一保存完好的瓮城。清代建筑文昌宫也保存完好，古戏楼外栏木刻浮雕令人叹为观止。说这些，是想让读者了解涑滩，我所关注的是这个“涑”字的由来。

大约三十年前，我到了涑滩，逛二佛寺、溜达古城，流连于瓮城，吃乡野菜肴……酒足饭饱之后，趁伙伴们厮



涑滩古城瓮城外和瓮城内（万思源 摄）

杀于方城或去会见周公之际，我拎着茶杯，在古城的大街小巷里穿梭，希望能找到一个熟悉涑滩历史的故老，讲讲涑滩地名的由来。那时，我不研究地名，只是好奇而已。在涑滩转了一圈，实在有些遗憾，不过，也听到了两个说法。说法一，涑滩是被水冲来的，最初叫来滩，后人不明，觉得来滩在水边，于是就给来字加了三点水。说法二，传说唐朝武则天时有个酷吏来俊臣，武则天没有处死他，让他躲到合川的乡野，因为他在这里住，这里就取名叫来滩，但他怕人知道，于是在“来”字旁边加了三点水。

我知道，这些只是龙门阵，听听可以，但要让人相信，可差得远。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收集资料，一直在想如何解读涑滩由来。今天，我可以来破解了。

目前，涑滩得名由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说，因渠江古名涑江，所以，这里的滩就叫涑滩。“古时渠江又称涑江，涑江流经此处多有险滩，涑滩因此而得名。涑滩古镇其实应该叫涑滩古寨，位于合川区东北 28 公里处，建镇于宋代，……”<sup>①</sup>涑滩来源于涑江，本来说是一个比较圆满的解释，然而，还是有漏洞。一则那么长一条涑江（渠江），为何仅仅只有涑滩据江取名？二来渠江古名涑

江，为何只在人们说涑滩的时候出现，其它地方不见任何记载，仿佛是为了解读涑滩而编的江名。

二说，滩流如草书“来”字，故名。

“涑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由于附近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而得名。”<sup>②</sup>这个只是一种想象罢了，草书的字，怎么看也不像江流。

三说，“涑滩，涑水福滩之意也。涑水就是现在的渠江，古人因江段内有巨滩绵延江中遂取名涑滩。”<sup>③</sup>称渠江为涑水，不多见，称涑滩为“涑水福滩”，堪称祝福语，无疑，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解读。

四说，江中来了一个滩，因名涑滩。

“涑滩最早得名为‘来滩’，寓意江中来了一个滩，因场镇临近江边并在原‘来’字前加了水旁，就形成今天的‘涑滩’，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不曾更改过。”<sup>④</sup>编故事的人似乎并不在意别人懂还是不懂，重点是他要说。江滩怎么可能被水冲来呢？除非是在神话里。

五说，则是前文提到的因来俊臣藏身于此而得名。

实话说，这些解读，或许是作者的顾名思义，又或者是来源于民间传说。涑滩之滩，最终因草街航电枢纽工程蓄水永远地沉没到江中去了，我们已不可

①陈中东，王海文：《重庆往事》，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

②南山梵景：《涑滩古镇凭啥惊艳全国？》。

③李俊蝶：《如果瓮城下雪》，《重庆晚报》2021年12月15日第4版。

④重庆市合川区地名普查办《涑滩的由来》。

能再去围绕着滩思考点什么。

多年来，破解地名时接触到的 lai 字地名告诉我，涑滩，极有可能是因为某个族群的居住而得名，那么，他们是谁呢？在不能解读的情况下，我就试着搜索涑滩四周有涑、来、癞等字的地名，你还莫说，真还收集到一些，如四川巴中癞子河、癞子湾、癞子坝、癞子沟、癞子塘，重庆云阳有来子滩，忠县有癞子滩，涪陵更有一个涑滩河（长江一级支流，全长 28.3 千米），酉阳后溪有癞子坟，沙坪坝以前的地名中有癞子坡，双桥区也有癞子坡……为了找到更多的数据，我在国家地名信息库中查了查含有“癞子”的地名，<sup>①</sup>数量最多的前五家分别为：四川 102 个。贵州 91 个，湖南 89 个，重庆 42 个，云南 21 个。这些地名透露出来的是什么信息？这个被称作 lai 的族群，肯定和这些省市有关联。我实在不相信这些地名都是因为癞子取

的，天下哪有那么多癞子？

在寻找过程中，我还发现了重庆西部的一条重要河流——濑溪河，它的发源地大足区中敖镇距离涑滩镇约 130 公里，它无疑是“涑”字家族中的一员，涑、濑只是记音用字不同罢了。这条河流经荣昌区、泸县，最后在泸州市龙马潭区的胡市镇汇入沱江，全长 238 公里（一说 195 公里）。濑溪河流经荣昌区河包镇时，还有一条河流汇入濑溪河，它也姓“濑”，叫濑川河，因为它的原因，从前河包镇叫濑川镇。

那么，谁是涑、濑、癞、来字地名的主人呢？



涑滩城内（万思源 摄）

<sup>①</sup>民政部区划地名司：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

涑滩一名，最早出现在宋朝元丰年间编著的《元丰九域志》里：“中，石照。四乡。云门、龙会、安坝、来滩、来苏、扶山、铜期、董市、茆城九镇。有铜梁山。”<sup>①</sup>石照，是合川在宋朝时的名称，当时，合川不仅有来滩，还有来苏，那么“来”是什么意思呢？

艰难寻找的过程省略不说，最终，我找到的这个民族就是仡佬族。翁家烈说，“尽管明清以来，仡佬族住地剧缩，人口锐减，许多地方已无仡佬族居住，但与仡佬族及其先民有关的地名比比皆是……徕子坡、徕子洞、徕子寨、赶徕墩、赶来溪……。黔中地区仡佬族因住居当地的历史最长，特被称为‘古族’或‘古老族’，黔北地区的仡佬族有的被称为‘古老户’。”<sup>②</sup>翁先生是仡佬族研究专家。他说今天的仡佬人，历史上被人称作濮人、僚人，再后来被人称作葛佬。铜梁、合川历史上确有濮人，还有一个故事作证。《舆地纪胜》引《图经》说合川钓鱼山有双王墓：“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民间还称这墓为濮王墓。历史学者认为，铜梁、合川古代有濮人居住，应该是真实的，至今，合川尚有濮湖、濮岩、蒲（音同濮）溪等地名，这些应该就是当时的濮人留

下来的。

仡佬族是怎么给 lai 扯上关系的呢？翁家烈说：“苗族称仡佬族为克或蒙徕；……壮族称仡佬族为布央、布徕；汉族称仡佬族为仡佬、古老。”<sup>③</sup>那么，这个“徕”是怎么来的呢？我最初推测，觉得应该是由“佬”或者“僚”演化为“徕”的：lao→lai。牛汝辰说：“从地名上分析，僚人极可能是古僚人（古濮人）的后裔。来与僚音近。民间又有徕子、赖子、奶子之称。”<sup>④</sup>翁家烈说：“‘癞子’实系仡佬族的另一称谓——‘徕子’之音变。徕与僚同声，故‘徕子’又可能是‘僚子’之讹。”<sup>⑤</sup>

或许有人会说，即便是涑滩之涑是徕子留下的地名，但是，作为作者你怎么证明呢？实在说，作者也只能说尽可能接近事实，因前人没有直接说过，我们是从分析中得来的结果。试看以下的数据：

1、曾经的合川，是濮人的天下，这里曾有濮王坟（今濮岩寺附近）。合川的涪江，旧名濮江，濮与涪音近。濮人，就是后来的僚人，再后来的葛佬、仡佬，它称徕子。<sup>①</sup>徕子，当今有人把他们定为“徕仡佬支”。“1990年5月，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召开徕民族成分讨论会，

①王存撰，魏嵩山。王文楚点校：《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329页。

②翁家烈：《仡佬族》（第2版），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③翁家烈：《仡佬族》（第2版），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④牛汝辰：《中国文化地名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515页。

⑤翁家烈：《道真仡佬考察》，遵义市文联《贵州2008-2010年·中国仡佬族》（内刊），第22页。



会议确定徭人属徭仡佬支，徭人认可为仡佬族。从6月1日起，隆林自治县及西林县千余徭人全部恢复为仡佬族。”<sup>②</sup>

2、合川历史上曾因僚人多，专设僚郡管理僚人。南齐时，齐高帝因贵州的僚人迁徙进入嘉陵江、渠江流域，故将东宕渠郡改名为东宕渠僚郡，属梁州，辖宕渠县（今合川）、平州县（今南充市南和岳池县北），汉初县（今武胜县）共3县，郡治合川。<sup>③</sup>

3、今天，合川仍有徭子居住过的痕迹，如奶子山（靠近狮滩镇下慈竹湾），赖子石坝（位于钱塘镇），癞子包（位于三汇镇四川矿院旧址附近）。

4、解释合川涪滩得名，必须能兼顾涪陵的涪滩，否则就不是正确的解释。唯一的解释，便是两地都曾居住过仡佬人。

5、涪滩居民，多数是移民来的，与濮人西来，有某种暗合。“而自当地百姓的宗谱或墓碑中我们可以看出，此地常住居民中的大部分是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裔，而涪滩古寨的建设主体也是他们（如位于古寨外与二佛村村委会交接处的一处清代元宝形墓志碑文不仅明确了此坟为当地李姓于清道光七年修建的祖坟，还详细记述了此支李氏

原籍湖广长沙府茶陵州茶乡之尾七都龙下，于乾隆己亥年迁移至此的史事）。”<sup>④</sup>

作者的这种说法与专家的说法有某种相似之处：“四川盆地东部这支专称的濮人，既无方号，可见是从江汉百濮迁徙进入的一支。这支濮人主要分布在今汉江下游，中心在今重庆市以北，涪江、嘉陵江和渠江相会的合川一带。”<sup>⑤</sup>相同之处是两者都来源于江汉平原，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时间。段渝说的濮人到合川也许很早，甚至在南北朝以前，而明末的移民与之相比，晚了一千多年。因为移民多、因为是码头，所以这里成了民间故事的聚集地。当地收集并出版了《合川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涪滩传说》，堪称奇迹。

仡佬人(徭子)曾经生活在我们身边，久而久之，我们忘记了他们的存在，比如，他们遗留的词汇，我们已经认为这些话本来就是重庆话的词汇了，<sup>⑥</sup>比如：

1、饭，叫 Māng māng。有人写作厖厖。厖，普通话读 máng，声调上合不起。

2、肚囊皮，肚子。仡佬语的 nāng(囊)，指肚子；从前乞丐的歌谣唱：“穿的千家衣，吃的万家谷：盖的肚囊皮，睡的背脊骨。”

3、一 pǎi 长，pǎi 读音近派。两臂

①段渝：《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巴蜀文化研究集刊（4）》，巴蜀书社，2008年，第20页。

②周小艺：《中华民族全书·中国仡佬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9页。

③王文光：《王文光民族史论文自选集》第170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④胡中华：《合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涪滩传说》，《合川日报》2023年1月5日A4版。

⑤段渝：《四川通史·卷1·先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33页。

⑥陈遵平：《贵州境内仡佬族转用汉语西南官话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7页。

平伸所量的长度。

4、响竿儿，划破的竹竿，用于驱赶禽兽。

5、lāo，读音近捞。偷。但重庆话中的lāo，似为小偷小摸：“他lāo了我一些东西，溜了。”

6、读pā，食物软。音、义是古老的，字据说是现代四川著名作家李劫人创造的。

我们身边的仡佬语词汇，还有很多。说实在的，在我没有读到《贵州境内仡佬族转用汉语西南官话研究》<sup>①</sup>这本书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些词汇就是重庆方言词汇，根本不知道它来源于仡佬族。

就在我要结束全文的时候，我读到了刘复生的专题研究《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与语言遗存——僚人入蜀再研究》

<sup>②</sup>他认为僚人入蜀，遍布四川，以他们语言命名的地名遗留至今，其中就有本文涉及到的来（涑）滩镇、来苏镇、濑（赖）溪、濑（赖）川镇等<sup>③</sup>，重新审视本文全文，觉得入川僚人的后裔族群称还是称葛佬好一些，虽然仡佬与葛佬只是声调上的差异，但这更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

最后，我的结论是：涑滩是因为历史上曾有仡佬人居住而得名。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退休）

责任编辑：周怡彤

①陈遵平：《贵州境内仡佬族转用汉语西南官话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刘复生：《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巴蜀书社，2011年，第47～48页。

③刘复生：《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巴蜀书社，2011年，第46页。

## 路孔古镇的前世今生

陈朝权

笔者在荣昌工作14年，初到荣昌时，就听说路孔古镇以丰厚的历史文化和旖旎的水乡风光闻名遐迩。期间因工作需要陪同参观过路孔古镇，但都只是走马观花。前不久，专程前往古镇采风，探访古镇的前世今生。

路孔古镇位于荣昌区东部，依山傍水，山、水、城交相辉映，素有“小山城”的美誉，是重庆市人民政府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镇，先后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路孔古镇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自然风光秀丽，系“两湖”“两广”填四川集散地，是一个以水兴市、以市兴镇的寨堡式古镇。早在宋明时便是渝西著名的水码头，民间传说丰富，舞龙舞狮、扭秧歌、喊号子、唱山歌、节气歌、划龙舟、打旱魃、坐茶馆、跳巫舞等民俗民风富有特色。古镇人文资源丰富，哺育了明代刑部尚书喻茂坚、革命先驱赵宗楷、抗日英雄柳乃夫、科学家赵宗燠等大批名人。明清时期因中科考及习武

者多，被誉为“翰墨之乡”“武术之乡”。曾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的荣昌籍诗人李应升游览路孔古镇时作诗《五律·题荣昌路孔古镇》：“绿野笼烟霭，园林草木春。风情存古寨，河道入通津。水远千帆小，山高一月明。名乡留记忆，百代共红尘。”<sup>①</sup>中国楹联学会名誉理事冯泽尧游览路孔古镇时留下《七绝·游荣昌路孔镇》：“灵山风物最多情，浅濑清溪映日月。翰墨香承千古韵，满街联语和莺声。”<sup>②</sup>

### 一、古镇发展历程

路孔古镇得名于一段民间传说：相传明朝时期，有位叫曾傲的和尚云游到此，见河对岸一带景色宜人，适于修身养性，便决定在此建座寺庙。偶觉坡边有六个石孔，似与河中相通，便往石孔倒入糠壳一试。不久，糠壳果然从河中冒出。人们就把这里叫作“六孔河”，后来又称为“路孔河”，古镇因此得名。曾傲修建的寺庙，名为万灵寺，曾经香火旺盛。路孔古镇于2013年正式更名为

①重庆市荣昌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國雅韻》（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年4月，第60页。

②重庆市荣昌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國雅韻》（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年4月，第40页。



三圣宫

“万灵古镇”。

南宋时期起，路孔古镇便是水码头与物资集散地，官府的钱粮兵器都从这里经过，修建有供客商住宿的客栈，以及堆放货物的码头商铺等。清代嘉庆五年（1800），为防御川东白莲教起义的战火，当地绅士及乡民在水码头的基础上扩建了大荣寨。咸丰十一年（1861），为防堵云南李永和、蓝大顺的抗清农民起义军，当地土绅捐钱、捐粮对大荣寨进行补修。同年，起义军张国福部曾围攻大荣寨。历经数百年，大荣寨的旧貌虽已改观，但城墙上几处尚存的彩绘图案依稀可见。民国元年（1912），设路

孔乡，沿袭到解放后。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败兵试图进寨受阻。1958年，此地先后置为高店、路孔人民公社。1984年，恢复为路孔乡。1993年，改设为路孔镇。2002年，路孔镇被评为“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2009年，被评为重庆市“最具魅力小城镇”。2010年，获“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称号。2012年，投资修复恒升门和太平门两道古城门；实施古镇“一街五景”建设，对新街1万余平方米建筑进行风貌整治；对明清老街赵氏宗祠门厅和尔雅书院等1.3万平方米古建筑进行维修重建，当年被评为重庆十大最美古镇。2013年，为更好地还原古镇历史，“路孔”正式更名为“万灵”。“万灵”的称呼远在“路孔”之前，万灵寺名称可以追溯到东晋咸和元年（326），曾与大足石刻、乐山大佛齐名。2014年，万灵古镇申报湖广会馆、三圣宫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年猪祭祀”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争取到国家发改委资金启动了古镇核心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同年12月，国家旅游局批准万灵古镇风景区为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吴元杰曾作诗《七绝·重游万灵古镇》：“千年路孔换新颜，古迹生辉联语甜。陶醉填川当日景，雾观江岸钓鱼欢。”<sup>①</sup>

<sup>①</sup>重庆市荣昌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国雅韵》（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年4月，第208页。

## 二、古镇历史内涵

路孔古镇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古镇，蕴含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

路孔河是大足区经荣昌区、隆昌市到泸州市行船的唯一水路，上下客货船只多。河道中的白银滩，把濑溪河阻隔成了上下两段，往来船只来到此地，只能在地势较为平缓的东岸卸载、翻滩，之后，才能继续航行。因此，自宋朝起，来往船只都要在路孔停泊歇息，船上人员在此食宿和购买地方特产，路孔成为濑溪河上最热闹的漕运码头。人们见到这是一块风水宝地，纷纷迁徙路孔河修房造屋，从事行船和经商。经过历朝历代的建设，形成了里许长的街市水寨。水寨地处荣昌和大足的接壤之处，被唐代知州命名为大荣寨。一些小偷、扒手、匪盗盯住了这个发财之地，经常发生偷盗抢劫，寨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于是，寨主筹集资金，修建了高大坚固的石城墙，并修筑了太平门、日月门、狮子门、恒升门四道既高又宽且坚固的寨门，防止兵侵和匪盗扰乱。斑驳的古城墙和四道古寨门，古老而雄伟，走过历史的长河，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永乐三年（1404年）春，建文皇帝流寓于荣昌县北十五里的云峰寺。<sup>①</sup>有一天，建文皇帝一行六人到路孔河游览，只见街上古

色古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建文皇帝游览了四大寨门，观赏了夏布商行、折扇商铺、陶器商店，对“贡布”“贡扇”“贡陶”之精美赞不绝口。<sup>②</sup>

**四大寨门** 太平门，系万灵镇大荣寨四大寨门之东，取“天下太平，万物安宁”之意，寨门内过去是古镇的政治中心，因而位列四大寨门之首。日月门，系大荣寨的四大城门之北，门楼上有日月亭，门内有一瓮形古井，深12.2米，内设暗道通往河心，由重一吨多的石板遮盖。该井系嘉庆年间修建的战备设施，以备遭兵匪长期围困时取水传信之用。狮子门，为大荣寨保存最为完好的一道寨门，在大荣寨之西。有寨门二道，分为大门、二门，门板厚实，门杠粗壮，寨门十分坚固，门内壁上的圆洞用于插门杠，抵御外侵。此处曾为古战场，清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曾攻破大门，但未进入二门。恒升门，为大荣寨四大寨门之南，是从新街进入古镇最便捷的入口。恒升门与日月门遥相呼应，取“日升月恒”之意，寨内明清老街上行至此为最高处，寓意凡过此门者，仕人将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商人则财运旺盛、财源滚滚。

**尔雅书院** 尔雅书院为明朝刑部尚书喻茂坚所建。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替弹劾严嵩而获罪的谏官夏言陈辞，

<sup>①</sup>光绪《荣昌县志》卷之十七：云峰寺，县北十五里，寺在乐观山山腰，创自宋绍兴中。山顶有神仙观，登高一望，荣邑瞭如指掌。明建文皇帝流寓于此，题诗四首，今石壁字迹剥蚀，仅存其一。

<sup>②</sup>黄石声：《神秘的路孔河》，作家出版社，2010年4月，第103页。

受到夺俸处分。次年，喻茂坚辞官回荣昌故里，钟情于濑溪河畔的佳山秀水，定居万灵，修建了这座“尔雅书院”，以耕读教习子弟。

**沱湾码头** 沱湾码头建于宋真宗咸平元年（998），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此码头曾几度损坏，几度修缮，但原貌未变。南宋时期，万灵出产的宫廷贡品蜂蜜、蜂王浆以及宫廷美容用品花粉都在此装船转运，顺濑溪河而下，直抵都城临安，贡奉朝廷。

**湖广会馆** 湖广会馆系嘉庆九年（1804）由湖广来此移民集资修建的同乡集会活动场所，分为神殿、议事厅、厢房、戏楼、院坝五部分。正殿塑有禹王神像；两侧耳房供会首议事；戏楼、院坝供聚会或文化娱乐；厢房供读书或食宿。因会馆奉祀大禹，故民间又称“禹王宫”为“禹庙”。

**水碾** 水碾是古人为节约人力建造的水力碾米设施。即在较低处设置碾米的石磨，然后从高处引一股水，冲动石磨转动即可碾米。现存水碾不再用于碾米，修复为供游客观赏的水车。

**赵氏宗祠** 赵氏宗祠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光绪三十四年（1908）重修。位于古镇正街，卷拱式屋顶，抬梁式房架，四角翘首，青砖瓦屋，盘龙雕花，甚为壮观。宗祠坐南朝北，三进四重堂，一重堂为家族聚会所用的厅堂，二重堂

为家族子弟念书所用的学堂，三重堂为家族商议大事的议事厅，四重堂为供奉家族祖先牌位以及家规之地。总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80平方米，为木结构徽派建筑。四重堂有两根高大的石柱，上面刻有两副楹联：“孝弟格乡邻，昔先正有典型矣；循良光史册，我后人咸嘉赖之”“历唐宋元明迄今承体，犹是勋名不朽；由越豫荆楚於斯聚族，依然俎豆维新”。

大门旁有一横匾，上书：“万灵赵氏，乃宋太祖赵匡胤后裔。历宋元明清，经秦王德芳、御史赵卞，传至二十九世，有赵万胜于乾隆九年，遵旨‘湖广填川’，率七子一媳自昭陵入蜀，‘插占’于斯，渔樵耕读，甲子一轮，遂成望族。嘉庆初，始建宗祠。二百余年，是宗英才辈出，祠亦几经修葺，方具三进四重堂之规模。”赵氏宗祠是清代移民文化的一个历史见证，如今，成为游客游览路孔古镇的必留之地。诗人凌泽欣游览赵氏宗祠后题词：“飞来燕子绕雕梁，想象当年笏满床。草色荒阶苔藓老，谁能从此识沧桑？”<sup>①</sup>

**大荣桥** 大荣桥建于明朝正德初年，为石质平板桥，桥面由平整的大青石铺就，每块重约10吨，全长116米，宽1.75米，共有24跨，连接万灵东西两岸。中央桥墩上曾有龙头龙尾石雕，已被破坏。现存大荣桥几经修复，依旧保持原貌，为重庆市市级保护文物。

<sup>①</sup>重庆市荣昌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國雅韻》（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年4月，第37页。

**十八梯** 古镇老街上，有一处起伏不大的矮坡，因这里刚好铺设有十八级台阶，故得名“十八梯”。旧时，十八梯商贾云集，灯红酒绿，是名副其实的“小山城”。每步石阶都留下了古人的足迹，布满了岁月的风霜，是古镇沧海桑田的见证。十八梯每块台阶都是青石板，两旁的古典建筑皆具风情，错落有致，别具一格，展示着古镇的古韵。

**烟雨巷** 烟雨巷位于大荣寨日月门

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长 33 米，宽 1.5 米。巷道两壁高耸，间距较窄，恍若一线天。每当雨雾天气，寨门外江雨霏霏，巷道内烟雨濛濛，一派江南烟雨的景象。清代举人赵代仲便引用杜牧《江南春》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烟雨”二字为小巷命名，沿用至今。2011 年，小巷在“重庆最美街道”评选中，荣膺“重庆最美小巷 10 强”。诗人凌泽欣曾对大荣寨烟雨巷作诗：“小巷斜穿

古镇中，洞庭烟雨此濛濛。几多迁客留槐梦，直费骚人认迹踪？”<sup>①</sup>诗人姜学双对烟雨巷作诗：“古镇临溪旧巷空，昔年战鼓与刀丛。蒙蒙香雾诗朋醉，爽爽晨曦福地通。碧水粼波连暗井，银辉明月挂纱笼。淋淋石径单人走，远寺钟声暮霭彤。”<sup>②</sup>

**影视文化基地** 建于 2012 年，总建筑面积近两万平方米，主要包括县衙、州府大院、赵家宅院、乡约宅院、徽式家园、广式家园、宁徙家园、街道店铺、城门楼、城墙、土地庙等，完整地展示清代徽派建筑风貌。影视作品《兄弟兄弟》《填四川》《傻儿传奇》



十八梯

①重庆市荣昌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國雅韻》（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 年 4 月，第 37 页。

②重庆市荣昌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國雅韻》（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 年 4 月，第 221 页。

《返乡》《幸福马上来》等电影、电视剧在此取景拍摄。

**白银滩** 白银滩原名“大荣滩”，为濑溪河上传说故事“二十四个望娘滩”中的第五滩，因河面堤坝截流在此形成白银一样的瀑布而得名。白银滩上有圆孔数百个，是在冰川时期形成的冰臼，长时间经过流水冲击形成大小不一的小洞。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孙明全曾作诗《七律·万灵古镇白银滩》：“长桥枕浪白银滩，六孔奇闻众口传。飞瀑湍流喧旷宇，要津险渡踞江关。码头上下历千古，商旅往来经万船。古镇沧桑多少事，星移物换几重天？”<sup>①</sup>

**古城墙** 大荣寨古城墙系修建寨子时为了保护寨内居民安全依山临水而建，始建于清代嘉庆五年（1800），为城堡式建筑，全长246米。城墙由一块块巨石用糯米、泥浆、糠壳和蛋清等黏合起来筑成，城墙周围筑有四大寨门，寨墙高峻厚实，虽经200多年，依然和原貌无恙。

**小姐绣楼** 又名“沁芳阁”，原为一贺姓大户人家的住所，二楼的阁楼专门为女儿所建。古代，大户人家的小姐不能抛头露面，她们的生活起居都在绣楼上。此建筑的几扇门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制度，中间的大门供长辈及贵客进出，二门供家属、家眷进出，小门供佣人、下人进出。

**明清老街** 明清老街系清朝嘉庆时期，在明代水码头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并保留部分明代建筑。全长502米，有石阶102级，由山顶蜿蜒而下直达濑溪河边，犹如长龙汲水。青石板铺成的街面看得出日晒雨淋的纹路和人踩马踏的漕痕。建筑布局精巧、造型独特，飞檐翘角，穿斗抬梁，具有“青砖青瓦青石板，板门板墙镶格窗”的特色。

**抗战船闸** 濑溪河水流至白银滩，航道受阻，上下货物必须转船或采用人力拉纤，否则不能运行。抗战时期，为保障陪都重庆的物资供给，特修建此船闸，采用水涨船升，水降船降的原理，加快运送速度。故又称抗战船闸，承载着抗战文化。

### 三、古镇地域文化

路孔古镇古味浓厚，移民文化、茶馆文化等地域文化浓郁，让人流连忘返。

**移民文化** 明末清初时期，荣昌地区经历了长达近30年的战火，人口锐减。清朝廷采取“移民入川”的措施，动员湖广、贵州、江西等地人民来川落户。康熙、乾隆年间，有些外省移民来到了万灵，为了方便同乡间的交流，这些外省移民集资修建了会馆，并修筑了供奉大禹的“禹王宫”，赵氏宗祠、湖广会馆也是移民后的建筑。荣昌境内有85%的人口属于“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裔，随着电视剧《填四川》的拍摄，

<sup>①</sup>重庆市荣昌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國雅韻》（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年4月，第205页。



进一步挖掘万灵古镇的“移民文化”内涵。2015年4月27日，举办荣昌首届万灵古镇填川移民文化旅游节。

**茶馆文化** 万灵的茶馆起于何时，无从查证。有人说，万灵人一辈子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泡在茶馆里；也有人说，旧万灵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把子客多（吹牛皮的多）。茶馆是人们休息、喝茶、娱乐、消遣、打发时光的地方，也是享受各种文化艺术的地方。在万灵的茶馆里，可以听到川戏、曲艺、评书，也可以摆龙门阵、交流各种信息。在旧社会，许多生意都是在茶馆里谈成的。那些喝茶的人把手伸出来，在对方的袖筒里捏着对方的手，那就是在做交易。万灵人过去称“喝茶”为“吃茶”或“吃讲茶”，所谓“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乡民发生纠纷，习惯在茶馆找人评理，如果调解成功，输理一方给“茶钱”；偶尔也有调解不成，双方大动干戈的现象。如今，古镇老街有老茶馆近30家，大多摆设黑漆茶桌，长条凳，茶客坐在凳上，有的双手放在桌上支撑着头部，有的伏桌小憩。茶具大多用三件头，即茶碗、茶盖、茶船。茶船用于稳定茶碗的重心，避免烫手；茶盖用于刮动茶叶，控制茶水温度。在古镇老街茶馆泡上一碗茶，一边品茶一边看书，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安宁，感受“一碗清茶品人生，半卷闲书观古今”的味道。

#### 四、古镇民间习俗

路孔古镇杀年猪、赛龙舟、缠丝拳

等民间习俗传承至今，民俗风情令人心醉神迷。

**杀年猪** 荣昌生猪养殖业十分发达，并由此形成独特的年猪屠宰祭祀。荣昌“杀年猪”习俗历史悠久，早在清乾隆年间，本地养猪业就很兴旺，有屠宰户数百家，还有专门设立的屠工帮会负责年猪屠宰祭祀。杀年猪、吃杀猪饭成为荣昌人对一年收获的喜悦庆祝和对来年日子兴旺的殷切期盼。2007年1月，荣昌在千年古镇路孔镇举办首届“年猪节”，到目前，已连续举办十四届。每年的年猪节，通过年猪文化民俗展示、非遗展、美食展、厨艺大比拼等活动方式，成为荣昌区文商旅融合的一大盛事。“年猪节”祭祀活动全部参照古人杀年猪的传统方式进行，所有祭祀人员着对襟装，活动过程分为祭屠工祖师、肥猪出槽、宰杀祭祀、刨汤祭祀等十多道程序，所有程序都在悠扬的祭文演唱中进行。“年猪节”上，除了传统的文艺表演外，还有荣昌特色的金钱板、缠丝拳等民俗文化表演，观看夏布、折扇等非物质文化展示。荣昌“年猪节”在保留“宰年猪”“品刨汤”等传统特色项目的基础上，增设了“猪之嘉年华”游园活动，这在年猪节中开创了先河。荣昌年猪节不仅是巴渝乡村过年杀年猪、吃刨猪汤民俗的历史传承，更是一场“游古镇、品非遗、享美食、健身心、比厨艺”的现代文化盛宴。“中国荣昌猪·年猪节”独树一帜，已被纳入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收录进《中国节庆大全》，这也是全国唯

——一个以猪为主题入选的节日。

**放河灯** 是濠溪河流域流传至今的重要民俗活动之一。宋代道教提倡，中元节各地燃河灯、济孤魂、放焰口、演目莲戏，不少诗人留下杭州西湖放灯欢腾的诗篇。宋真宗年间，濠溪河流域漕运初兴，沿岸有多处寺庙兴建，佛事活动得以在民间广为传播。于是，放河灯便成为古镇的重要民俗活动之一。明清时期，濠溪河河运昌盛，船家和商贾期望河运平安顺利，沿河居民希望风调雨顺，遂于每年七月半大放河灯，赈济亡魂。历经了无数个岁月，如今，放河灯则被人们用以对逝去亲人的悼念，对活着人们的祝福。万灵古镇七夕河灯旅游文化节活动期间，游客们沿河放置河灯，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吉祥安康，寄托对美好未来的期盼，放河灯这一习俗被列为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4年8月2日，举办“灵动古镇，浪漫河灯”首届荣昌万灵古镇七夕河灯文化旅游节。2024年8月9日至11日，第九届七夕河灯旅游文化节在万灵古镇景区举行，共设13项子活动，开幕式璀璨烟花与河灯共映，七夕奇妙游、国风游玩将游客带入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民俗风情。活动还特别设置“七夕寻缘·相亲会”“怦然心动·点亮七夕”环节，为单身男女、恋爱男女搭建爱的桥梁。活动期间，在万灵古镇景区内设置爱情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灯饰，营造浓厚的七夕河灯节氛围。

**缠丝拳** 万灵古镇是著名的武术之乡，缠丝拳便发源于此。该拳为功力性

基础拳，动作虽仅有十二手，但招式清晰，发劲刚暴。缠丝拳以其独特的技击美、节奏美、劲力美、形神美、动作美等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特殊范畴，反映了东方古典艺术的神韵。更以“仁”与“和谐”的武德思想形象而执着地丰富着中华传统美德。缠丝拳不仅是一种武术形式，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精神象征，在万灵古镇的文化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1937年，武林高手陈子庄和姚玉堂在湖广会馆举办“双雄会”，以比武为名，倡议武林中人踊跃参军，激发了万灵人的血性，在他们的感召下，包括万灵在内的荣昌县，共有100多名武林中人陆续参军，奔赴抗日前线。2009年，缠丝拳被评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今，万灵古镇依然延续着习武之风。作为缠丝拳的发源地，很多外地人也慕名前来拜师学艺，想成为像陈子庄、姚玉堂这样武艺高强的侠士。

**赛龙舟**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万灵镇地处濠溪河畔，是历代重要水运口岸，当地民众特别注重一年一度辟邪祈福的龙舟竞渡。清代嘉庆九年五月初五日，路孔河水寨赵家出钱举办欢度端午节活动。这天一大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路孔河水寨码头，千人云集，十分热闹。河面上有一只大彩船，大彩船两边各五只小船，码头边有四只龙船。赵富仁站在大彩船船头，主持划龙船比赛。他摇着折扇，高声朗诵四言八句：“今日端午好热闹，路孔两岸人欢笑。四只龙船显本事，争夺奖鸭称英豪。”话音刚落，

赵富永就在大彩船点燃火炮，赵富盛吹响战鼓，赵富身敲响大锣，几个年轻人吹响长号和唢呐，四只龙船从大码头出发，向大荣桥冲去。最先到达的龙船为一等奖，奖四只水鸭，意为四季发财；二等奖，奖三只水鸭，意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三等奖，奖两只水鸭，意为两全其美；四等奖，奖一只水鸭，意为一生平安。从此，经常举办划龙船比赛，并逐渐形成地方特色。2023年12月，赛龙舟被列为荣昌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24年6月9日，“千年荣昌·龙舟争渡”端午龙舟赛在万灵古镇濑溪河流域开赛，比赛设置200米和500米直道竞速赛，26支参赛队伍展开激烈角逐，上演一场水上的速度竞赛。

### 五、古镇特色美食

古镇上的母猪壳、黄凉粉、艾粑、麻圆等特色美食，芳香四溢，令人垂涎三尺。

**母猪壳** 母猪壳即桂鱼，因其嘴翘肚大，形像母猪，故称它为母猪壳鱼。古镇的母猪壳多为渔民在濑溪河打捞的野生鱼，肉质丰厚坚实，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肉多刺少，清蒸味道最佳。

**艾粑** 艾粑用野生艾叶经过熬煮后加入浸泡磨成粉的糯米中，揉制形成叶绿色，再搓成大小适中的长形米团裹上粽叶用蒸笼蒸熟便可食用。

**手工麻圆** 麻圆用糯米粉加白糖、猪油和水揉制成形，再经入锅油炸而成。因其呈圆形，表面沾有芝麻，故名。古镇麻圆采用纯手工工艺制作。

**黄凉粉** 黄凉粉切得像土豆丝一样细，成条不烂，软而不断，味咸鲜，微辣带麻，姜、葱、蒜香味突出，成菜后色泽红亮，有粉质感。因其不放酱油、醋，碗中便没有水汁，用盐和豆粉做成的粘稠盐芡，将各种佐料都粘附在凉粉上。

**油炸川子鱼** 川子鱼为濑溪河野生小鱼，约为食指一般大小。将鱼肚清理干净，用盐、料酒、味精、花椒面、胡椒面码味之后过油酥炸，起锅撒上辣椒面和葱花，既可当小吃，又是饭桌上的开胃菜。

**灰水粽子** 灰水粽子采用植物烧灰，柴灰虑水所得的碱水将糯米浸泡透，使糯米染上淡黄色，再用箬叶包成四角小粽。古镇的灰水粽子多为原味，形状以三角粽和马蹄粽居多，剥开后沾上混有芝麻面的白糖食用味道更美。

万灵的古街、古寨、古码头、古民居、万灵寺、喻茂坚纪念馆、提琴博物馆，以及民风民俗、小吃、非遗都是万灵古镇移民文化元素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万灵镇中相互交融渗透，自然和谐地延续至今，无不见证了当年移民运动发生的情景。建议有关部门提高古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机制，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监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古镇作用，体现古镇价值。

（作者单位：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退休）

责任编辑：周怡彤

## 清清濯水濯我心

文 猛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拜访重庆黔江著名古镇濯水，奔着的就是这个独特地名，总感觉这千年古镇这美丽的阿蓬江会与屈原会与孔老夫子有关——孔子曰：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

事实上，屈原和孔老夫子都没有到过古镇。

濯，洗之意，水，洗之物。濯水，还有比这更清新的地名？

重庆是著名的水码头之乡。美丽的阿蓬江自东向西流淌。因为美丽的阿蓬

江，濯水古镇自古与乌江、酉水一起成为沟通三峡地区和江汉平原的重要通道，成为这无数水码头中不能忽略的重要驿站。

那些飘扬于唐末的古镇酒旗，我们在奔流不息清澈如镜的阿蓬江中找不到它们的倒影，但那个叫“濯河坝”后来叫“濯水”的地名却永远温馨在旅人的心中。作为川黔两省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作为渝东南驿道、商道、盐道的必经之路，舟楫帆影，汇于濯水，商贾乡民，交易于市。我们的父辈祖辈不管是从彭水到龚滩，还是从龚滩到彭水，行路的

人们都得必经濯水这方水陆码头，投向店铺林立、酒旗飘扬的古街，枕梦之后第二天再踏旅程。旅途的劳顿，风霜的凄厉，一碗罐罐茶的等待，一碗绿豆粉叶儿耙马打滚的等待，一碗濯水咂酒的等待，一方梦枕的等待，就有了力量，有了



濯水古镇

渴盼。濯水，成了行路人多么温馨的一方枕梦之地，成了旅人一方多么幸福的驿站。

在阿蓬江清澈的浪花声中，走过古老的青石板街，看看山，望望水，曲径通幽处，青石板路温润如玉。碧波荡漾里，白墙黑瓦倒映其中。

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当铁路、公路、飞机这些现代化的交通不断缩短我们的时空和距离，今天在路上的人们已经很难有古人这般“断肠人在天涯”的行路感受。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各地兴起一股古镇建设的热潮，那就是怀念，那就是回望，那就是对历史长河的凝望。就像我眼前的濯水，聆听大门上那些古老朴素的对联，抚摸石碑之重、阿蓬江之清、古道之长，所有的世俗，所有的浮躁，所有的烦闷，在这条古老的老街上，在那些古老对联的教诲中，在这清静静的河水中，不濯缨，不濯足，濯洗的是那颗在历史的沟壑中沧浪得苦涩的心。

濯水，枕梦之地。濯水，濯梦之地。

走进濯水，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古镇的戏楼。

把一座戏楼作为一座古镇的封面，这在我拜访的古镇古城中的确第一个。

一个地方的美酒、香茶是一个地方山水风物、风土人情的浓缩和升华，品尝的是静的美。一个地方的古戏则是这方乡土生活的剪影，欣赏的是动的魂。张扬一台戏欢迎你，给你一个激昂的心调，足见濯水人的豪放和艺气。

更为让人惊异的是濯水独特的“后河古戏”，以一种“半台锣鼓半台戏”的激昂传达濯水人心中的悲欢，让人过耳难忘。对于那古戏、古戏楼我实在没有妙笔去描述，因为再美丽的描述也不及那戏楼处处的古老对联的讲述——

“古镇澜回，千声犹荡土家韵；高台风起，百载远惊巫峡云。”

“两水润新园，绕岸轻波堪濯足；七弦萦古镇，连台好戏可清心。”

“丝弦醉月，水袖裁云，演古镇传奇，半台锣鼓半台戏；韶乐绕梁，霓裳焕彩，添武陵神韵，百代风骚百代情。”

品读这些深邃的古老对联，我们还能有什么可说的？

伫望戏楼，濯水人的后河古戏、山歌、哭嫁歌、木叶情歌濯心濯耳，余音绕梁，但是这绝不是这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古镇兴盛不衰的原因。中国人好逐水而居，中国的历史以及经济繁荣都是从江河开始的，那就是河流文明。因为美丽的阿蓬江而让酒旗飘舞，生意兴隆。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方才有经济的繁荣，商贸的繁荣。

在濯水有“樊家的锭子，汪家的银子，龚家的杆子，余家的顶子”“四家”之说，足见这四家在濯水的份量。

作为一个粗糙的小文人，我无法用笔去描述那些融合土家特色建筑的庭院、柜台、榨油房、酿酒房，我只能从这些古商号大门上的对联去遐想那些曾经的繁华和濯水人对“天理良心”经营理念的讲述，今天的古商号虽然没有物质的

繁华，却有精神的濯洗，大约这也是濯水多次更名都少不了那个“濯”字的原因。

汪家是濯水古镇商业的领头羊，事实上汪家的银子应该是詹家的银子汪家的院子，应该是很早的招商引资，只不过，詹家不是招来的，是自己走来的。

“徽商不呆家，经商走四方”，“走四方”寻找投资商机的徽墨制造商詹氏家族，像一粒卷在风中的种子。那阵风从徽州婺源卷起来，一路翻山越岭，看见这条江，看见这汪水。载着詹家过来的那条船来了，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那条船没有丝毫的改变。身边阿蓬江的水一路向西，流了一年又一年，没有丝毫的改变。詹信安改变了，他把钱投向这里，把心安放这里。一路江多水多码头多，这方濯水的古镇给了这粒种子落根的动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濯水良好的投资环境给了这粒种子生根、发芽、生长的呼唤。

今天，我们不再使用汪家大院的徽墨“金不换”来记录我们的生活和思想，今天我们也不再使用汪家“钱店”的“半边钱”来解决大额货币找补问题，烟墨的清香早已记不住“半边钱”的拷问，因为，我们的心也如同这“半边钱”一样撕成了两半，一半是对诚信的敬仰，另一半是对现实的嘶鸣。

在汪家的大门上，有这样的对联：

“雕梁画栋，不铆不钉，喻众人不伪不斜不诈；阔门豪宅，大开大合，装天下大仁大义大忠。”

“成以勤，节以俭，看檐翘廊回，

珍藏两字传家宝；立于信，行于诚，任客来商往，通用一篇致富经。”

朴实、纪实、说实，没有好高骛远、气吞山河的盛气凌人，表明我的房子就是这么修的，我的诚信不是给人看的，我就是这么做的。

诚信不仅是濯水商人秤杆上的一粒准星，更是检验人们为人处世的标尺。

再看榨油坊、酒坊和烟房上的对联，更是朴素而精彩，就像那古老的榨油号子，回响江畔，就像那醇香美酒，永驻齿间——

“风雨不惊，听隐隐号声，韵融古镇两江水；沧桑难抹，看层层油印，香入老翁一袋烟。”

“秋月清明，月照人酩村酒醉；春风煦暖，风流木榨菜油香。”

余家最珍贵的遗存是“八贤堂”，一个很深的院子，33道门，66座雕花柱廊，99根立柱和188朵雕花窗。对于余家，人们用“一门三进士、四代五尚书”来形容余家人才辈出。

我们看余家的“光顺号、八贤堂”大门上高挂的对联——

“借融融月色，梦到阿蓬，诗文一脉传香远；将淡淡心尘，浣之濯水，风物百年沁玉清。”

“血融蒙汉，旗出八贤，家山总带芝兰气；心浸诗书，儒承百代，梓巷犹传翰墨香。”

“光前裕后，立信开诚，百鼎精深欣济世；顺道应天，扶危解难，九芝馥郁巧回春。”

与世无争中透出书香门第的自豪、悬壶济世的自信。

濯水老街拐弯处就是龚家有名的抱厅，这是古镇上唯一一家将穿枋做成弧形的房子，俗称“猫拱背”房子。丽日融融，天在屋中落，屋在宇宙嵌，这样设计多少透露出主人对于征服世界的雄心。作为古镇上唯一拥有枪杆子的大家族，虽然因其镖行和习武之人众多，在镇上有着强大的势力，却世代传承和发展着濯水的麻糖产业，家中常年支起大锅逢集施粥、救济贫苦，被百姓称为活菩萨，被朝廷旌表“乐善好施”。枪杆子的冷漠和乐善好施的温情让我们对龚家肃然起敬——

“抱璞归真，衣食自经营，庭除不使喧尘到；乐施好善，精神长播布，兰桂时吹淑气来。”

“交心结义，抱此一亭，风雨飘摇留记忆；舍爱施恩，济之百姓，声名淡泊显襟怀。”

龚家是这么彰显门风的，历史也是这么感叹的。

在和汪家大院相隔不远的樊家大院，“深径绕庭轩，几历沧桑，犹存一院坚贞气；敞厅留岁月，屡经霜雪，未泯千秋侠义风。”这是和古镇其他古院一样的注脚。

古镇人说，“樊家的锭子”之说对樊家有些不公，抑或有些不准确，樊家并非强取豪夺之恶徒，而是伸张正义、爱打抱不平之大义。樊家有钱了，他用钱开办“濯河坝讲堂”，讲堂前有开放



天理良心碑

式凉亭，据说是当地乃至全国都鲜见的开放式讲堂。樊家有钱了，但是樊家的大院既不设大门也没有售货的柜台，就和古镇的街道一样。正是樊家人博大的胸怀，才有了濯河坝讲堂这所让濯水的优秀文化得以传承的精神殿堂。

在樊家大院过厅上方，挂有一块牌匾，上书“云蒸霞蔚”四个大字，下面挂有一副“嘉声远布，厚德长承，堪追思侠义男儿，忠贞女子；古院犹存，老街宛在，宜秀览钟灵濯水，毓秀巴山”的对联。樊家男子一个个早早地离开人世，家庭重担落到了樊家女人身上。樊家几代女性，用无法言语的艰辛劳动和贞节女人骨子里的坚强、节俭，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了濯水四大家族之一。

走过讲堂，只要你细心聆听，抑扬

顿挫的讲学声，总会穿越时空而来。生活的起起伏伏，人生的恩恩怨怨，就会消失在茫茫的岁月里，唯有“俭”长留人间。

在濯河坝讲堂凉厅之外，当街立着一块1米多高、宽约半米的石碑，他立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阴刻着“天理良心”四个大字，这是极为少见的“道德碑”，以警示古镇商贾，经商为人、处世之道在于“天理良心”。

有人说，它是邻里分田时留下的纪念。也有人说，它是附近一座寺庙劝人立德的遗存。更多的人说，它是古镇商人遵循的不二法则。

我不想去追究那早已斑驳的“天理良心”四个字出自哪里，但我敢肯定，它“警世名言”是真、“大诚止于信”是实，那四个字是用青石刻写出来的，更是濯水人用诚信铸造出来的。石碑斑驳，字魂永在。

我们行走在这条古老的街上，我们和那些远去的人们同处在一个空间里，只是时间已是不同。隔着久远的时光，我们能看见他们生动的身影，能听见他们喧哗的市声。一个小小的古镇，居然拥有万寿宫江西会馆、万天宫江浙会馆、禹王宫湖广会馆，可见外来客商之多，经济之繁荣，足见地之灵。一个小小的古镇，走出全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气象学家、化学家，足见人之杰。

因为那面心中永不褪色的“天理良心”的旗帜，那方濯水濯心的召唤。

澄江如练，阿蓬江的水缓缓西流。面对一条倒流的江水，面对今天这个正在缺乏诚信的时代，纵然时光可以倒流，天理良心不可倒转！

事实上，同着中国很多的古镇一样，今天来来往往的人群不再是为了生计奔波，更多的是为了心灵，为了感受那曾经温馨幸福的慢生活。山水是可以用手机徐徐留下的，人文却是必须用心细细品读的。我们不期望古镇的老街能够再次创造曾经的辉煌，但是走过古镇走过老街，老街的故事就会像阿蓬江水一样流淌，流进古镇人的血液里，也流进我们的心里。

在龚滩古镇，著名画家吴冠中对他笔下的龚滩说：“是唐街，是宋城，是爷爷奶奶的家。”

其实，吴冠中应该先到濯水。

走进古镇老盐行客栈，主人冲上清茶，端来团子粩、冲冲糕。聆听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品尝小镇淡淡的清茶和美食，我们宁静如诗。陪同的朋友说，今天下雨，街上游客较少，要在平时，真还难得有这般的清静——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濯水，濯去世间陈杂，也濯去浮躁人心。繁华也好，清寂也罢，不变的是古镇的天理良心。

濯水，濯心之地也。

（作者单位：重庆长江人力公司）

责任编辑：张莉